

# 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 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

洪廣冀\*\*

## 摘 要

本文以日治時期臺灣的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為中心，一方面透過史料的交叉檢證，探討矢內原忠雄以降、研究者對該事業在臺灣資本主義化中的定位是否恰當；另方面，本文亦帶入殖民政府觀看臺灣林野的方式、不同制度在連結後的非意圖後果以及林野本身的異質性，在整體的尺度下探討日治初中期林野事業的性質。

日治初期，殖民政府透過制度將林野區分為林地與林產等客體以界定利益關係者的權利內涵；然在面對臺灣既有的林野舊慣時卻不時面臨舊慣與新規間難能接續的問題，直至林野調查才以保管林等緣故關係地的設置初步解決。與之對照，在政府理蕃與荒地開發等考量下進駐官有林野的資本家，其運作雖是以林地為主的拓殖經營，但透過林產價值方得以成立的「遺利」，毋寧是促成資本與政府結盟的重要誘因。一九二〇年代在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展開後，殖民政府將林野調查查定的官有林野區分為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同時將地緣人民與其佔有的緣故關係地清理出來，透過授產、知識灌輸與法令強制，政府嘗試將之改造為鑲嵌於國有林中、可自行維生又無礙於山林保育的林業家，同時裨益因一次大戰而勃興的林產事業。然而，被安置於不要存置林野內、未及整理的資本家，趁著局勢改變與既往拓殖經營之便，其作業竟造成當時保育意識下的濫伐。對此，殖民政府一方面集中國有林野的經營權，另方面重新界定與資本家的關係以推動林野經營的集約；不料前述政府主導的經營模式卻在殖民母國與國際局勢的夾擠中，讓林野的遺利甚有浪費或「貨棄於地」的危機。在此脈絡下，一套源自歐陸的知識體系——近代林業——終被援用，森林計畫事業即試圖以此套體系革新既存的經營體制且緩解林野事業的現實困境。就日治初中期的林野研究史而言，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隱含其中的演化史觀與拿理論硬套歷史的疏失，同時也為臺灣資本主義化的研究傳統與南亞環境史的對話提供可能空間。

關鍵詞：林野，林野整理、資本主義化、近代林業、環境史

---

\* 本文的完成要感謝柯志明、李文良、劉翠溶、鄭欽龍等師長的長期指導，以及朱瑪瓏、廖法銘在地圖繪製上的協助。本文曾發表於「走過臺灣：世代、歷史與社會研討會」（臺灣社會學會主辦，2004年12月4日），感謝評論人李文良教授的指教。兩位匿名審查人悉心而詳盡的修改建議，亦讓筆者獲益良多，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 一、前言
  - 二、日治初期的林野分類架構與「遺利甚多論」
  - 三、林野調查與邊區的分層統治
  - 四、官有林野整理與民有林野的成立
  - 五、林產處分制度的改革與林野事業的制度化
  - 六、林業經營的危機與森林計畫事業
  - 七、臺灣林野研究史的再思考
- 

## 一、前言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化」堪稱日治臺灣史的首要分析概念之一；貫穿一九一〇至二〇年代的林野調查與官有林野整理，<sup>(1)</sup> 在時序上不僅銜接矢內原忠雄所稱的「資本主義基礎工事」——土地調查，緊接著展開的森林計畫事業，亦被視為「資本征服臺灣全土」的先聲。<sup>(2)</sup> 本文將以此段時期為中心，一方面透過史料的交叉檢證，探討自矢內原以降，研究者對「林野之資本主義化」的解釋是否恰當；另方面，本文亦帶入殖民政府觀看臺灣林野的方式、不同制度在連結後產生的非意圖後果以及森林本身的異質性，在整體的尺度上探討日治初中期林野事業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其後篇幅將回顧矢內原以降的研究累積，尤其是針對研究者係如何使用「資本主義化」這個分析觀念，並根據何種指標論證資本主義化的確在臺灣的林野中發生。

---

(1) 從事業的進程來看，林野調查與官有林野整理應視為林野整理事業的兩階段而非分隔的兩事業；參考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以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65-68。但無論如何，這兩階段的運作邏輯並不相同；李氏也指出：「二階段的組合才是臺灣林野整理事業的全部過程，在這樣的前提下進行比較才有意義。」同上註，頁67。

(2) 「基礎工事」與「征服臺灣全土」分別出自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1929），頁22、29；周憲文將前者譯為「基礎工程」，參考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臺北：海峽學術，1999），頁18。

在《帝國主義下の臺灣》（以下簡稱為《帝國》）一書中，矢內原忠雄將林野的議題集中在「臺灣資本主義化」的「土地問題」內處理。林野調查整理在此被類比為日治初期的土地調查，為「日本資本主義征服臺灣的必要前提與基礎工事」。明治四十三年（1910）登場的林野調查確立了 916,775 甲的官有林野與 56,961 甲的民有林野，面積遠大於民有林野的官有林野則貸渡（租借）或賣渡（放領）予資本家經營。然官有林野內含括的緣故關係地——即人民已有土地佔有之事實，卻無可資證明之憑證——造成資本集中土地的障礙；接踵而至的官有林野整理即在解決此項問題。林野整理區分出要存置林野 319,294 甲與不要存置林野 398,541 甲，自後者之中放領 266,399 甲的林野地，其中約十八萬七千甲為原先的緣故關係地。經此整理後官有林野已所剩無幾，資本主義若要進一步發展，勢必將腳步推進蕃界。在這個意義上，矢內原推論道：森林計畫事業的目的在於「讓蕃地獲得自由」，「由此一來，資本征服臺灣全土。」<sup>(3)</sup>

讀者或會質疑筆者詳列各調查數字的目的何在，後文將具體舉證，就是這些數字讓矢內原深具演化性與目的論的理論推演成了仿若不用檢證的歷史事實。馬克斯就原始積累之「兩方面」的論說：「資本關係的創造過程，不外是勞動者與其擁有的勞動條件分離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將生活與生產資料轉為資本，另方面則把生產者轉成工資勞動者。」<sup>(4)</sup> 在《帝國》中成了一前一後的兩大章節。矢內原一方面將林野私有權體制的明確化，殖民政府與其「助產」的資本對林野之支配關係的形成視為資本主義化的指標，另方面又將林野調查與整理的內涵視為前述過程的反映。<sup>(5)</sup> 唯有在論證「土地終究集中在資本家手中而不會成為問題」後，矢內原方能進入《帝國》關切的主題：人民失去生產工具，成為受雇於農企業的無產勞工。<sup>(6)</sup> 然須強調的是，矢內原儘管對其建構的資本主義化模型深具信

(3)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8-24。

(4)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Ben Fowkes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 874.

(5) 矢內原寫道：「即對林野建立私有權制度，誘導資本及資本家企業向林野發展，就是林野的資本主義。」中譯引自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1。

(6) 不過，此分析意識下的資本主義化也未成真；參考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2003），特別是頁 88-97。

心，<sup>(7)</sup> 在行文中還是透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之處。就其所見，殖民政府協助資本的手段可分為二，一類堪稱「合法且平穩」，也就是賦予人民近代化的土地權利後，讓資本遂其集中，另則為「透過軍憲援助以將人民土地強制沒收」的原始積累。<sup>(8)</sup> 矢內原指出林野調查與整理堪為前者代表，惟就後者的舉證即略顯牽強。他舉出以為「顯著之例」者為發生在竹山、斗六與嘉義等郡的竹林事件；只是該事件係發生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前，並非《帝國》主張的、資本向林野浩蕩進軍的時點。或許因為如此，矢內原僅將事件始末放在附註，讓讀者自行體會。<sup>(9)</sup>

誠如涂照彥所言，《帝國》就資本主義化的定義毋寧過於寬鬆；<sup>(10)</sup> 但無論如何，矢內原提醒後續研究者「殖民政策並非鐵板一塊」，卻是思想的寶貴遺產。然或許是受到戰後氛圍影響，論者在精確資本主義化意所指時，卻有意無意地將殖民政策的多樣性消解掉了。例如涂照彥雖對矢內原論證的「田園資本主義化」提出繁複的替代分析，但對林野的處理卻十分狹隘；<sup>(11)</sup> 為了論證林野調查與整理不過是為了剝奪殖民地人民的土地，涂氏不惜扭曲矢內原的原意，將原本用來指涉「部分緣故關係地遭到沒收」的竹林事件，擴大為殖民政府對緣故關係地的收買。<sup>(12)</sup> 涂氏認為此舉「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施展了其掠奪和統治的伎倆，是直接侵害私有財產制，也是以國家權力的直接介入來累積資本。」<sup>(13)</sup> 對照矢內原筆下殖民政府的「文明」，<sup>(14)</sup> 涂照彥竟可徵引同樣的經驗素材，直指為「赤裸裸的剝奪」，不能不說是種吊詭。

涂照彥欠缺經驗證據的控訴，為臺灣史研究者梁華璜予以補充。他側重矢內

(7) 《帝國》成書的昭和四年（1929）是森林計畫事業還在執行的時刻；在尚未見到該事業的具體成果前，矢內原即稱該事業將讓「資本征服臺灣全土」，信心可見一斑。

(8) 馬克斯所說的原始積累在《帝國》的原文與譯文中均稱「本原積蓄」；參考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9-10、24-28、54等。然相較於馬克斯筆下「以火與血寫成的歷史」；參考Karl Marx, *Capital*, p. 875，矢內原在使用此詞彙時已與馬克斯略有不同。基本上，矢內原將以林野調查整理為代表的、「賦予人民林野財產權以讓資本遂其集中」的「合法且平穩」也算為本原積蓄。

(9)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25-26、頁26註17。

(10)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1992），頁2-7。

(11) 也許是意識到此項缺陷，涂氏強調：「當時（約1910年），日本人對臺灣的統治已大致走上軌道，而本地人民主要是以農業為經濟基礎，對林業則相對疏遠。」同上註，頁40。不過，涂氏的「田園資本主義化」也不盡然符合歷史實情；參考柯志明，《米糖相剋》，特別是頁11-15、146-151。

(12)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41與註39。

(13) 同上註，頁41。

(14)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27-28。

原論點裡的原始積累面向，將矢內原置於附註的竹林事件改稱為「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掠奪林地的開始」。<sup>(15)</sup> 梁氏細究清領時期臺灣人民的林野利用慣習與邏輯，進而討論此邏輯如何在殖民政府、警察官與資本家的聯手下遭到壓抑，其賴以維生、悉心維護的竹林如何在林野調查的諸多挑剔中慘遭掠奪，從而解釋農民群起反抗的成因。<sup>(16)</sup> 梁氏將舊慣與新規並列分析以凸顯兩者的替代關係，無疑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然而，正如臺灣史研究者李文良所說的：這種「剝奪／反抗論」不免將林野調查與整理視為「預謀且完美的掠奪設計」，「臺灣的資本主義化相對被忽視，使得戰後（臺灣史）研究的業績停滯，甚至倒退。」<sup>(17)</sup> 李氏提出的「合理／合法化論」認為：殖民政府係藉由各種統治柔軟化的設計以順應舊慣，迴避林野調查整理時引發的社會不安，臺灣的林野從而確立近代化的財產權體制，「得以有效的經營」。<sup>(18)</sup> 然而，前述設計卻造成官有林野所剩無幾的意外後果，成為政府進一步導入近代林業體系的障礙。<sup>(19)</sup> 在這個意義上，合理／合法化論一方面修正矢內原階段且演化性的歷史解釋，指出總督府為了統治需要，甚至可將掠奪殖民地的意圖放在一邊；另一方面，他亦暗諷剝奪／反抗論的前提——有個全知全能的殖民政府存在。

由矢內原開其端緒的林野資本主義化，歷經涂照彥、梁華璜以及李文良的批判與繼承；雖在經驗證據上多有補充，核心概念卻似未曾動搖。由於矢內原論述的「兩面性（即同時強調殖民政府的粗暴與文明）」使然，剝奪／反抗與合理／合法化論各自選擇軍憲援助與合法且平穩的面向進行發揮。姑且不論前揭論述的個別缺失，關鍵問題是：當矢內原不過是將林野事業的開展做為其資本主義化論的註腳時，林野事業的內涵與邏輯真能放在一個演化圖式中一體對待？當研究者站在矢內原的基礎上論證殖民政策的粗暴或柔軟時，他們顯須說明，為何在日治時

(15) 梁華璜，〈竹林事件探討——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臺灣林地之一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5（1978年7月），頁246-247。

(16) 同上註，頁263-270、274-283。

(17)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7-8。

(18)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以「緣故關係」為中心〉，《臺灣史研究》5: 2（2000年4月），頁52。

(19)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106-109。就李文良而言，「近代林業體系」是指以要存置林野為基礎、森林保育為原則的經營型態。參考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第六章。

期國家一直是林野的擁有者與經營者，邊界清楚、財產權明確的林野並未如矢內原預期地向資本手中集中。準此而言，或許矢內原不應將「資本主義化」如「萬能丹」地應用在各層面；<sup>(20)</sup> 但就林野的相關研究來看，問題的癥結反而是，研究者也不應片段且片面地「套用矢內原」。

立基在前述思考，一個替代解釋的建立須確認資料是否支持矢內原對林野之資本主義化的論說，進而追問林野是如何納入殖民統治且分配予不同利益關係者使用。在這個意義上，本文首先分析殖民政府對臺灣林野的理解方式，認為政府的「林野觀」不僅影響林野事業的內涵與邏輯，更牽涉到政府對政策績效的自我評估。其次，本文亦強調因徑互賴（path-dependent）的重要性；若我們很難接受資本主義能以有條不紊、彷彿「不可能鑄成不可挽回之錯誤」<sup>(21)</sup> 的方式開展，我們也很難相信順應真能如此有效而不會產生矛盾或自我擊敗，尤其當國家、資本家、人民各有其利益考量且被鎖在各自的制度層時，我們更須追問新規對舊慣的順應、政府對資本家的培植是在什麼前提下給予怎樣的權利內涵。第三，森林絕非同質的「自然」，不僅在生態上包括林木與林地、針葉林與闊葉林等部份，在地目與制度上亦包括森林與原野、林野與林產等區分；換言之，林野事業的內涵與開展不是單一旦均質的過程，研究者實須在一個整體尺度上說明其間歧異且多重的變遷。有鑑於林業史、環境史、社會經濟史在面對前述過程時各有側重且缺乏對話，如何在更寬廣的政經脈絡中說明林野事業的政策目標與執行成效，構成本文的第三個題旨。

以下篇幅共分七節，第二節主在說明林野調查前殖民政府之於臺灣林野的分類架構、相關制度與背後的邏輯等，第三至四節則以林野調查與官有林野整理為中心，一方面透過史料的重讀與新史料的發掘，探討矢內原以降的研究者對前述事業的解釋是否允當，另方面，筆者也嘗試在前述面向上（林野觀、因徑互賴與整體的分析尺度）定位林野調查與官有林野整理，據此提出修正或替代性的解釋；第五至六節則聚焦在二〇年代中期，說明殖民政府在林野調查整理、經營策略等

(20) 「萬能丹」一詞出自涂照彥對矢內原的批評；參照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4。

(21) 引號內出自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頁11。

面向的調整為何在當時釀成林野事業的危機，在這個意義上為森林計畫事業的浮現予以脈絡化；結論則在前述基礎上反省資本主義化與林野事業的關聯，進一步為臺灣資本主義化的研究傳統與南亞環境史的對話提供可資深化的題旨。

## 二、日治初期的林野分類架構與「遺利甚多論」

明治二十八年（1895）十月三十一日，臺灣總督府以日令二十六號公佈「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sup>(22)</sup> 該令首條即定義無上手地契的土地納為官地，第三條指出在官地裡從事的開墾土地、伐採樹木與製腦等事業，行為人應持清國發給之使用執照向各官廳據稟呈覽。民政局長水野遵並於同日以訓令十七號將處理原則通知各官廳，說明使用執照係指臺灣樟腦硫磺總局、撫墾局、樟腦稽查局等官衙所發給，且為地方認可之有效證件。<sup>(23)</sup>

在日治臺灣的林野研究史上，日令二十六號的目的與成效一直頗有爭議；從剝奪／反抗論的觀點來看，該令毋寧是以「無主地官有做為擋箭牌」，「赤裸裸地剝奪臺灣人民的土地」。相較之下，李文良則以詳細的個案研究說明：與其強調日令二十六號的目的是在成立廣大的官有地，倒不如認為，其效果在於讓殖民政府能於短期內掌握臺灣土地利權的分配實態。<sup>(24)</sup> 但無論如何，剝奪抑或資訊掌握的意圖能達成幾分，還須回溯至清朝的土地行政。清朝地方官在面對人民的請墾案，一旦經附近番社與漢庄鄉職人員具結為「民番無礙」的無主荒地，便發給申請者墾照。持有墾照的墾戶若在期限內將土地墾熟，經報陞後換發丈單便取得業戶地位。<sup>(25)</sup> 政權交替後，手持丈單的業戶可藉日令二十六號第一條獲得權利的延續。然而，其他未墾、未墾成、未陞科與私墾的土地，將因訓令十七號秉持的「文書主義」而難免被納入官地的類屬。值得注意的是，日令二十六號不是將土地區分為官地與民地<sup>(26)</sup> 即已自足，從第二與第三條的內容來看，若我們承認開墾的對象

(22) 日令二十六號全文參考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 301。

(23)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38-40。

(24) 詳細討論參考同上註，頁 44-46；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 25-29。

(25) 柯志明，〈番頭家〉，頁 86。

(26) 較精確的說，日令二十六號僅分出無上手證據的官地與有上手證據的「民地」；後者向「民有地」的轉換（不一定是一對一的轉換），直至土地調查時期「以小租戶為業主，以業主權稱其權利」方才確定。

物在於土地、伐木則在於林木的話，殖民政府顯將官地區分為地、木兩類客體分別處理。依據舊慣調查會的說法，日令二十六號將「無上手地契者歸為官地」的做法是在延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sup>(27)</sup>至於官地可細分為地、木的觀念則涉及內地林野調查的經驗。明治初年日本廢藩置縣後，除了可依證據書類證明其所有權的森林歸為民林外，其餘的森林盡納為縣林再逐步轉為官林或御料林（專供皇室使用的森林）。<sup>(28)</sup>以「文書有無」做為官民林區分判準一度引發農民激烈抗爭，迫使明治政府一再放寬民林的認定原則以免過於衝擊地方既存的林野利用慣習。然就在認定原則已擴及「佔有事實」，也就是人民持續佔有或長期使用的森林亦以民林視之時，明治政府逐漸意識到，關鍵不僅是認定原則的鬆緊，而是以土地為單一對象物的分類架構並不能包容幕藩體制下的林野舊慣。<sup>(29)</sup>準此而言，就在日本殖民臺灣前夕，明治政府方將林野區分為地、木兩類客體以重新界定人民的林野利權，進而將之納入明治三十年（1897）「森林法」規定的森林使用型態。<sup>(30)</sup>

回到臺灣的脈絡。將森林區分為地、木兩類客體的分類架構亦延伸至「有上手證據與林野地契」的民地中。明治二十九年（1896）總督府以府令十三號公佈「樟腦製造業取締細則」，「新開民木製腦之途」。<sup>(31)</sup>該法第二條指出：「欲以民木製造樟腦者，必須添付民有證據書類，向所屬撫墾署長提出民木樟腦的申請製造願，等待許可。」<sup>(32)</sup>此法說得相當模糊，究竟「民有證據書類」是針對土地還是其上的林木？所幸，同時公佈的「撫墾署長心得要項」有著較精準的定義：「連民有私地之樟樹也禁止伐採則有苛酷之嫌，因此擬在管制之下准許民木製腦。」<sup>(33)</sup>前揭宣稱透露的訊息是：在政府原先的分類裡，民地不代表其上的樟樹也順理成章

參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以下簡稱《臺灣私法》），頁234、289。

(27) 同上註，頁95。

(28) 北條浩，《日本近代林政史の研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94），頁191-296。

(29) 關於日本林野調查的轉折，參考杉本壽，《林野所有權の研究》（東京：清文堂，1976），第一章。

(30) 在這個意義上，日本森林史的研究者常將明治三十年（1897）視為近代林政元年。參考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發達過程：その實證的研究》（東京：日本林業調查會，1990），頁14-15。

(31)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1924），頁19、30-32。

(32) 同上註，頁25-26；譯文引自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29。

(33)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誌稿》，第一卷（東京：青史社，1989），頁17-18；譯文引自王世慶，〈日據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494。



地轉爲民木；只是此舉實在過苛，方以民木製腦予以放寬。此外，民木的認定範圍也不僅限制在樟樹，其他與人民生計相關的林產物也算做「民木」。準此而言，民木製腦與日令二十六號的搭配——前者爲民地，後者爲官地，共同爲臺灣的山林地景，依土地證據書類の有無，界定出個別的權利內涵（參考表一）。

明治二十九年（1896）九月，南庄「賽夏族人」<sup>(34)</sup> 絲大尾、日阿拐依據前述「樟腦製造業取締細則」向南庄撫墾署提出民木製腦申請。主辦其事的水間良輔署長意識到總督府的林野政策是「生蕃不得以任何名義取得土地所有權」，乃上書力陳絲等自清末受大科崁撫墾局招撫以來，雖在清朝體制裡列爲半生半熟的「化蕃」，但「進化程度已與熟蕃無異」，建議督府准許其製腦申請。<sup>(35)</sup> 面對水間良輔的建言，民政局長水野遵並未正面回應，他以民殖二七八號通知各撫墾署長，內容旨在設定「林木官民有的區分標準」：<sup>(36)</sup>

申請民木製腦者若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時，應做民木調查：

1. 具有完整之民有證據書類者
2. 在有樹木種植或森林養護事蹟之土地，其植樹者或養護者之情況明確者
3. 其他有明確之事實所有事蹟者

此外，水野遵亦補充道：自清政府處取得的墾照，其准墾範圍內的林木比照第一項原則辦理，但持有墾照者應依日令二十六號重新提出申請。<sup>(37)</sup>

絲大尾等的申請、水間良輔的建言與水野遵的回應，其實反映著三種歧異的立場。首先，絲等認爲其土地擁有明確的證據書類，土地屬於己身所有，據此申請土地之上的林木爲民木，程序上合情合理。其次，水間良輔認爲，這些賽夏族人的進化程度已與熟蕃無異，不適用於總督府「生蕃不得擁有土地」的規定，故建議承認絲等的土地權利，完成民木認定的必要前提。第三，水野遵（或以水野

(34) 「賽夏族」自然不是「沒有歷史」的族稱，晚近的討論參考胡家瑜、林欣宜，〈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2003年12月），頁177-214。

(35) 全文見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頁30-31。

(36) 同上註，頁31；譯文引自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30。

(37)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頁31-32。

遵爲首的民政局官員)認爲,蕃人是否擁有土地,茲事體大;他並未正面回應,似乎暗示土地應維持官有。就其發佈的民殖二七八號來看,水野遵可能是意識到日令二十六號的關鍵漏瓢,也就是在林木的官民有認定上,新規與舊慣實有難能接續之處。

讓我們回到日令二十六號的分類架構。依據該令第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官地內從事樹木伐採者應持舊政府之憑證向地方官廳提出申請;此法要能落實,必要的前提是,清廷要有發給人民伐木證照的行政程序才行。然而,除了沈葆楨開山撫番前,軍工匠首由官給牌戳,匠首再發給小匠腰牌以憑進入蕃界伐木,<sup>(38)</sup>以及清末規定欲入山從事伐木製腦者,應獲撫墾局許可方得入山等情形外,清廷並未有發給人民伐木證照的程序,也未試圖就此課稅。<sup>(39)</sup>甚至,由於「伐木鋸板,抽藤弔鹿」常是漢番衝突的先聲,清廷對民間的林產採取行爲還抱持相當負面的態度。

儘管林產利用的正式法令幾近於無,民間還是自行發展出各類制度安排,如山工銀、柴山等,規範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林產利用關係。<sup>(40)</sup>此外,開墾土地的必要前提——除去地表林木,更是人民獲得林產物的主要管道。<sup>(41)</sup>但不論是民間自行遵循的慣習或是藉開墾之便以獲得林產物,在日令二十六號公佈後,前者有違該令惟官方文書是賴的原則,後者又依《私法》見解:墾照雖可做爲人民之林野業主權的憑證,然而林野「古來未曾丈量賦課」難以轉爲新規,人民難以據之擁有土地,也就不能獲得合法伐木的權利。<sup>(42)</sup>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殖民政府試圖以日令二十六號延續民間林產採取的舊慣,但由於舊慣與新規實有難能接合

(38) 程士毅,〈軍工匠人與臺灣中部的開發問題〉,《臺灣風物》44:3(1994年9月),頁15-19;陳國棟,〈「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1995年3月),頁123-158;陳國棟,〈臺灣的非拓墾性伐林〉,收於劉翠溶、尹懋可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95),頁1017-1062。

(39)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頁14。

(40) 參考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1979),頁122-123、145-161、174-176等。

(41) 參考陳盛韶,〈軍工廠〉,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噶瑪蘭廳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160種,1963),頁381-382;陳國棟,〈「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頁131-133。

(42) 關於清朝山林的「業」如何轉爲日治土地行政的「業主權」,舊慣調查會其實設想了不少方式;例如田園之附屬物、事實上的佔據、買賣、官之給墾等。參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一卷下(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1910),頁66-71。

表一 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的分類架構

		林木	
		官	民
林地	官	A	B
	民	C	D

之處，民間的林產採取舊慣難免被歸為「官林盜伐」，殖民政府若要嚴加取締，後果或許是如藍鼎元所稱的「全臺有不火食之患」。<sup>(43)</sup>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對「樟腦製造業取締細則」成立的民木製腦，以及民殖二七八號公佈的認定原則有著更深入的解讀。首先，「樟腦製造業取締細則」准許擁有土地證據書類者可使用地表的林木，只是臺灣的林野多無可資證明其業主權的證據書類，此法顯行不通。<sup>(44)</sup> 民殖二七八號列明的「林木官民有的認定標準」，首先放寬文書原則的適用範圍，讓只是一種「開墾申請」的墾照也可做為民木的決定判準。進而，政府在文書規則之外又增添佔有事實原則，即申請人若無土地所有權狀，但有具體的樹木種植或森林養護事跡時，該片森林亦可以民木視之。在釐清林野舊慣與新規間的接續問題以及殖民政府所做的調整後，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絲大尾等的民木製腦申請可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一月通過，其土地的業主權卻未被官方承認。<sup>(45)</sup> 透過絲大尾等的申請案而反映出的民木製腦爭議，其意義既是在凸顯日治初期的林野分類架構，也涉及原住民、地方行政官員與中央部會在此架構中的認知座標。表一正可幫助我們小結前述討論。絲大尾等對自身位置的認定相當於 C，故申請民木製腦以轉為 D。但就水間良輔而言，絲等的位置其實在 A，但他力陳絲等應具備 C 的資格，從而轉成 D。惟就水野遵的立場來看，他更關切的是，如何將 A 中的難以定義的舊慣分離出來；民殖二七八

(43) 藍鼎元，〈覆制軍臺疆經理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征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第 12 種，1958），頁 34。

(44)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一卷下，頁 75-77。

(45) 具體展現即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由南庄獅里興社蕃人絲卯乃引發的「捐地事件」，該事件顯示當時總督府仍未承認蕃人的土地業主權。對此事件的討論已超出本文範圍，其發生經過可參考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 98-101。

號爲其嘗試，即根據放寬的文書原則與佔有事實原則，讓部份 B 可與 A 分離。

自然，林野事業的開展不僅是將舊慣妥爲分類而已，同等重要的是，能否爲相關利益關係者重啓合法、近代化且利於政府監控的森林取用管道。在這個意義上，總督府在處理絲大尾等人的民木製腦問題時（1896），亦以一系列的林野新規定立日治初期官木與官地使用的基調。首先是以敕令三一號公佈的「官有森林原野及產物特別處分令」；該令以窮舉法列出十六種林木與林地的使用方式，指出在這些情形下，臺灣總督可不採「競爭入札（標賣）」而改以「隨意契約」之法將官地或官木「特買」予申請人。<sup>(46)</sup>一個月後府令四十四號「臺灣官有森林原野產物賣渡規則」與四十五號「臺灣官有森林原野貸渡規則」公佈，官木與官地的使用使被納入不同制度規範。<sup>(47)</sup>也就是說，以府令四十五號申請官有地貸渡的申請者，其在官地上的施業若涉及林木，申請人還得依敕令三一號或府令四十四號另外提出申請。<sup>(48)</sup>

明治二十九年（1896）十一月，林務課擬定相當於內地「官有林野實況調查內規」的「森林調查內規」，並自內地集結大批專業人員進入蕃地。<sup>(49)</sup>這批躑躅在「土匪猖獗」、「生蕃狂暴」之林野地的林學者，詳載了各調查區的林相，同時也透露殖民政府對當時臺灣社會與森林間關係的看法。<sup>(50)</sup>他們指出，臺灣天然林生長旺盛，幾全分佈在蕃地，惟蕃人不知如何利用，渡海來臺的漢人垂涎於森林的種種利源，不論是伐樟製腦抑或定居開墾，均對森林造成極大破壞。所幸「殘暴」的蕃人防堵了漢人朝內山擴張，蕃地尚有原始且自然的森林留存，「遺利甚多」。<sup>(51)</sup>

(46)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臺灣林野法規》（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1919），頁 70；參照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發達過程》，頁 74-83 對內地相關制度的解說。

(47) 洪廣冀，〈戰後初期之臺灣國有林經營問題：以國有林伐採制度為個案〉，《臺灣史研究》9:1（2002 年 6 月），頁 64-66。

(48)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臺灣林野法規》，頁 58。

(49) 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1），頁 15-16；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7），頁 450。

(50) 調查過程參考八戶道雄，〈臺灣の林業〉，收於寺尾辰之助編，《明治林業逸史》（東京：大日本山林會，1931），頁 449-457；調查目次參考陳偉智，〈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東臺灣研究》3（1998 年 12 月），頁 135-136。

(51) 如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1898），頁 295、300、302-303、309-311、343-348 等；亦可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の林野》（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1），頁 5-6、10-11。

時負責調查宜蘭、奇萊等區林況的總督府技師——月岡貞太郎，在其復命書中進一步展示「遺利為何甚多」的邏輯；<sup>(52)</sup> 他首先測量該區森林的總面積與蓄積，進而算出平均材積為每町步一千尺締（或稱尺束；約 0.3392 立方公尺），再假設該區森林輪伐期為一百年，得出每町步十尺締的平均生長量，最後配合地方木材消耗量的估計，月岡所獲結論如表二所示。

表二 宜蘭與奇萊地方森林總生長量與地方消耗量之比較

地方	森林面積 (町步)	生長量(尺締)		地方木材 消費量(尺締)	差額(尺締)
		每町步	總町步		
宜蘭	40,000	10	400,000	85,500	314,500
奇萊	200,000	10	2,000,000	13,500	1,986,500
總計	240,000	—	2,400,000	99,000	2,301,000

資料來源：月岡貞太郎，〈宜蘭奇萊兩地方林況〉，頁 306。

月岡貞並未言明前述辭彙的定義與論證過程，筆者將之重建如下：首先，設林木總蓄積為  $V$  尺締、總面積為  $A$  甲、總生長量為  $V'$  尺締、輪伐期為  $T$  年，則月岡貞認定之林木伐採的永續是每年固定從林中取得總生長量  $V'$ ，且森林之總蓄積  $V$  應保持不變。其次，月岡就輪伐期  $T$  的定義是： $T$  年後伐採者應可取得相當於  $V$  的木材，即  $TV'$  等於  $V$ ，故  $V'$  就會等於  $V$  與  $T$  相除之值。第三，再分別將  $V$  與  $V'$  同除以  $A$ ，即平均蓄積除以輪伐期會等於平均生長量，所以，該區域森林生長量是一千尺締之平均蓄積與一百年之輪伐期相除的結果。

將前述論證放在近代林業的系譜中視之，已然不同於近代林業於歐陸發軔之際以面積為基礎的經營方式，但也未如英國在印度所嘗試的，將森林視為以利滾利的資產。<sup>(53)</sup> 月岡貞太郎筆下的森林是以生長量成長的等差級數，而非以生長率

(52) 月岡貞太郎，〈宜蘭奇萊兩地方林況〉，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頁 277-314。

(53) 關於近代林業的系譜，參考 Karl Appuhn, "Inventing Nature: Forests, Forestry, and State Power in Renaissance Venic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2000), pp. 861-889; Henry Lowood, "The Calculating Forester: Quantification, Cameral 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Forestry in Germany," in T. Frangsmyr, J. Heilbron and R. Rider eds., *The Quantifying Spirit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pp. 315-342. 關於英國如何在印度建置類似體制，參考 Ravi

增殖的等差級數。從表二可見，地方木材消費量比起森林生長量簡直不成比例；這位樂觀的森林家因而指出，日後待地方繁榮與人口增加之際，兩百餘萬尺締的木材剩餘，每尺締以拾錢計算，不但可應付地方的木材需要，且相當於二十餘萬圓的林業利潤：「樹木若不將其自林中取出利用，自會腐朽；此莫大之天賜遺利，豈可袖手旁觀！」<sup>(54)</sup>

不過，就當時的林野部門而言，「遺利甚多，故須殖產」的構想儘管明確，但這些森林利源多處蕃地，且蕃人自有其使用慣習且不容侵犯，林野事業的開展勢必將蕃人的影響納入。明治三十五年（1902），總督府發動針對北蕃的「樟腦戰爭」，參酌參事官持地六三郎的意見，將北部各廳轄內的隘勇線加以連接推進，隘勇線推進後佔領的「包容地」則貸渡或賣渡與資本家經營。此舉引發官有林野的圈佔風潮，不獨資本家，部份零細農民亦積極加入搶佔。<sup>(55)</sup> 對此，因為當時生蕃與土匪尚未完全平定，總督府態度曾相當謹慎：「即使許可了，不僅事業之成功遙遙無期，對於地方治安與蕃政也會有不少危害。」<sup>(56)</sup> 資本家取得林野的管道多是僅具使用權的貸渡之法，然當蕃務規模日漸擴大，總督府鑒於資本家可配合推動理蕃政策、促進蕃地土地開發，在行政方針上做出讓步，積極將之納為邊區統治的一環。<sup>(57)</sup>

前述轉變也可從制度的內涵中看出。明治四十年（1907）公佈的「臺灣樟樹造林獎勵規則」，規定造林業者可無償租用官有林野從事樟樹造林，成林後可獲土地業主權。<sup>(58)</sup> 明治四十四年（1911）「臺灣官有森林原野豫約賣渡規則」亦規定，官地得租予業者從事植樹、開墾與畜牧等事業；申請造林者若在二十年內造林成

---

Rajan, "Imperial Environmentalism or Environmentalism? European Forestry, Colonial Foresters and the Agendas of Forest Management in British India 1800-1900," in R. Grove, V. Damodaran and S. Sangwan,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24-371.

(54) 月岡貞太郎，〈宜蘭奇策兩地方林況〉，頁306。

(55)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194-195；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科坎（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3:1（1996年6月），頁157。

(56) 李文良，〈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183。

(57) 同上註，頁184-203；萩野敏雄，〈朝鮮、滿州、臺灣林業發達史論〉（東京：財團法人林野弘濟會，1965），頁453-460。

(58)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頁722-725。

功，亦可獲得土地業主權。<sup>(59)</sup> 這些制度均使總督府可以隨意契約之法將大面積官有地交付予特定申請人，責其完成政府政策並以業主權為酬庸。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強調土地開發而不是偏重於特定產業；例如三井和名會社在臺北廳、桃園廳蕃界的事業，便是開墾、造林、製腦與伐木等活動同時進行。成書於一九一〇年代的《臺灣の林野》即明白指出：此類林野經營實與內地「迥異殊趣」，堪稱一類「拓殖經營」。<sup>(60)</sup>

《臺灣の林野》對臺灣林野事業的評價其來有自；林業做為一類產業，原本是以林產為主體的森林利用方式。並且，面對臺灣木材供需不足以及森林利用相當有限的現實，如何有效利用林產資源，更直接關係到林野事業的成敗。但拓殖經營的林產事業多是附帶於林地開墾之上；租用官有林野的資本家若須清除地上竹木，或將之作為樟腦、製糖燃料用材時，<sup>(61)</sup> 只要劃定區域，列明區域內的樹種、株數、目測直徑等項目，向總督府提出「拂下願（處分申請）」後即以特賣之法辦理。資本只要設法將林產搬出，依材積乘上總督府公告的標準單價，繳交代金價額即可。<sup>(62)</sup> 相較於內地通行的標賣之法得因申請人的競標而拉高木材單價，臺灣總督府在特賣中獲得的利潤相當稀少；對於資本賺取市價與標準單價間差額的做法，總督府無法也無力去干涉。在這個意義上，即便一九一〇年代的臺灣林野呈現一股拓殖熱潮，仍不免被林業官員稱為臺灣林產利用史上的「渾沌時代」。<sup>(63)</sup>

從日令二十六號的公佈到明治四十年（1907）總督府終於初步解決邊區拓殖的潛在威脅，林地與林木一直是政府在界定利益關係者之權利內涵的兩條軸線。然在面對臺灣既存的林野利用慣習時，殖民政府的新規實有支絀之處，一旦分類即會出現難能歸類的問題，導致政府須增添原則或放寬判準以將之納入。與之對照，在政府理蕃與荒地開發等考量下進駐官有林野的資本家，其運作雖是以林地為主的拓殖經營，但透過林產價值方得成立的「遺利」，毋寧是促成資本與政府結

(59)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務法規》（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4），頁 63。

(60)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の林野》，頁 34；該段落原發表於〈林野開拓情形〉，《臺灣時報》15（1910年9月），頁 65-66。

(6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領臺二十年臺灣林業之沿革並成績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6），頁 43-44。

(6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務法規》，頁 80-84。

(63)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臺灣の林業》（臺北：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1933；昭和八年版），頁 84-85。

盟的誘因。臺灣林野的拓殖經營直至一次戰後方有更動，明治四十三年（1910）起陸續展開的林野調查，其初衷仍在解決舊慣與新規的接續問題，如下所述。

### 三、林野調查與邊區的分層統治

起迄於明治四十三至大正三年（1910-1914）的林野調查事業，全臺十二廳的調查甲數總計 973,736 甲，查定為官有者達 752,091 甲，民有僅 31,179 甲。<sup>(64)</sup> 林野調查的對象一方面是土地調查時刻意跳過、地目為山林原野的土地，另一方面，相較於土地調查，林野調查的範圍已向淺山地帶大幅擴張。但無論如何，林野調查的範圍並未超出蕃界，也就是總督府在土地調查後確立的一般行政區與特別行政區的界線（參考圖一）。<sup>(65)</sup>

林野調查結果中官民有林野相差懸殊的情形，就剝奪／反抗論者而言正是殖民政府剝奪人民利權以推動資本主義化的明證。但合理／合法化論者李文良並不同意前述論法，他批評道：剝奪／反抗論看不見官有林野裡尚有「緣故關係地」的存在。李氏指出緣故關係地包括保管林、無斷開墾地與預約賣渡地三類，均是針對地緣人民（日文作地元人民）之林野舊慣未能吻合日令二十六號的文書主義而設計出的「救濟制度」。李氏區辨出官有林野查定過程中各認定原則的轉變，指出在林野調查前敕令三一號已有「依地籍調查所發現的開墾地，應賣渡給開墾人」的規定。大正元年（1912）西部林野調查前，總督府又提出事實佔有的原則，即「人民依襲善意，多年且平穩佔有之土地，得承認其業主權」。大正二年（1913），總督府復針對「林野調查之際發現的田、園等開墾地」做出處分決議，「對這些開墾地，若由開墾者提出拂下開墾願，在無害土地整理的情況下，得比照敕令三一

(6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5），頁 1、3、7-8。

(65)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 103。然須強調的是，從圖一看來，西部臺灣至少有兩處調查地是明顯逸出蕃界；一則是北宜山區因樟腦開採、樟樹造林與官有地貨渡而釋放給三井的官有林野，另則是位於南投的模範竹林與東京帝國大學演習林（參考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概要》〔東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1940〕，附圖）。然持平而言，這些區域均非西部臺灣的普遍情形。究竟土地調查、理蕃以及林野調查的關係為何？顯然還須更多區域的研究成果方能說明。此外，東部臺灣的林野調查相當於西臺灣的土地調查；參考李文良，〈林野整理與東臺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型態（1910-1925）〉，《東臺灣研究》2（1997 年 12 月），頁 169-190。筆者將另文說明東臺灣的林野事業與西臺灣的異同。





圖一 林野調查區域示意圖

說明：1.「既登錄地」相當於土地調查的範圍。「未登錄地」是指土地調查時「未登錄」的區域，包括地目為山林與原野的土地以及淺山地區。換言之，「未登錄地」即相當於林野調查的範圍，面積 973,736 甲。

2.原圖比例尺為五十萬分之一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附圖；原圖收藏在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臺灣資料區。

一號辦理，依合理地價放領與原開墾人。」是年（1913），總督府即以調查與公佈諭告之法成立保管林制度。<sup>(66)</sup> 李氏認為，林野調查將緣故關係地在「將來會放領予原佔有人」的承諾下收為官有，但允許佔有者可持續既有的土地利用。「臺灣淺山地區的林野由清朝順利地過渡至近代。……（是）總督府不斷學習適應臺灣特殊之土地關係的結果。」<sup>(67)</sup> 筆者將三類緣故關係地的定義列在表三，各類緣故關係地的筆數、甲數與價額則如表四。

由前段的描述可知，李文良對林野調查的理解是不同於剝奪／反抗論的；值得對照的是，矢內原忠雄也相當重視緣故關係地的存在。矢內原認為，林野的資本主義化係以林野的官民有區分為前提，緣故關係地因而被視為一類「殘餘」，是等待被「消除」的類屬。<sup>(68)</sup> 相較之下，李文良更為正面地對待緣故關係地的功能，並將之標舉為林野產權之明確化的緩衝機制。<sup>(69)</sup> 李氏標舉為分析核心的是，清代墾照的權利內涵，並將之與佔有事實的認定原則相比較。徵引《私法》的見解：「（清朝）官之給墾以土地之開墾為目的」，李氏認為，這意味著在殖民政府的土地

表三 緣故關係地的類別與定義

名 稱	定 義
保管林	官有林野內，也有為當地人民久經善意佔有，而從事林木伐採等經濟利用，對其土地雖不承認業主權，但其利益則予以保護。乃在保管林名義下，允許其繼續佔有與利用，惟賦予某種限制，並徵收相當之保管費。
開墾 拂下地	未經政府許可即行佔墾且完成土地改良，地目為田、園者。該佔有人得依法申請將開墾地放領，程序完成後的土地即屬民有。
預約 賣渡地	又稱新規開墾地。在精神上延續日令二十六號，讓超過申請期的墾照持有者或新的申請人可再藉由各式預約賣渡或貸渡規則，申請開墾繼續保有墾權，以便在土地墾成後進一步取得業主權。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47-51。

(66)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47-48

(67) 同上註，頁 51-52。

(68)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9-21。

(69)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52。

表四 林野調查完成後各廳緣故關係地的筆數、面積與價額

	保管林			開墾拂下地			預約賣渡地		
	筆數	面積(甲)	價額(圓)	筆數	面積(甲)	價額(圓)	筆數	面積(甲)	價額(圓)
臺北	68,715	80,975.1050	41,451.53	4,581	804.5887	23,903.92			
宜蘭	8,465	8,845.9285	4302.51	1,800	427.9455	16,723.79			
桃園	1,360	1,517.5280	969	337	215.5270	3,751.92			
新竹	16,183	36,810.7050	35,266	663	588.9316	22,660.1			
臺中	9,397	10,719.6058	10,336.08	2,282	734.8065	35,389.96	566	274.4779	19,400.45
阿猴	3,616	3,298.1905	2,395.13	3,082	973.5457	24,368.38	483	263.5813	13,177.97
臺南	9,777	12,083.5760	11,275.61	5,270	2,211.6362	72,415.65	378	95.2311	3,538.93
南投	2,177	5,011.5760	3,475.30	1,319	673.7975	31,168.39	511	229.5755	13,914.95
嘉義	7,724	13,650.5275	12,076.68	3,454	2,581.9574	80,457.77			
總計	127,414	172,912.7423	121,548.63	24,788	6,212.7361	130,773.71	1,738	862.8658	50,036.30
比例	82.77%	96.07%	40.20%	16.10%	3.45%	43.25%	1.13%	0.48%	16.55%

資料來源：不著撰人，〈林野調查及保管林業事務概要〉（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複製收藏），未註明頁碼；原出處為〈鈴木三郎文書〉。

說明：1.「價額—開墾拂下地」一欄加上底線的數值為「未完成處分之地」；未加底線者為「完成處分之地」。

2.「價額—預約賣渡」一欄之加總應為 50,032.30 圓，50,036.30 圓為資料所列之值。

行政下，並不會賦予墾戶以墾照包圍之土地的業主權。<sup>(70)</sup> 然而，殖民政府並不能對墾照此官方文書視而不見，尤就墾戶而言，墾照涵蓋的範圍係透過合法程序而來，理應擁有某種支配權利。因此，李氏認為，墾照之涵蓋範圍內未經報陞的土地，其強度略遜佔有事實一籌，故殖民政府特將之置於緣故關係地的類屬下，一方面讓人民權利獲得延續，另方面政府也得以完成林野的官民有區分。進而，李氏亦以大科崁地區的陳集成墾號為例，指出墾戶若不慎讓墾照失效，殖民政府亦將之轉為緣故關係地處理。<sup>(71)</sup> 簡言之，李氏認為緣故關係地的成立原因有二：一是墾照包容範圍裡的未墾地，二是墾戶無心之過所致。

基本上，前述論證有著三處不足：首先，《私法》的確承認墾照可做為林野業主權的官方憑證，只是因未曾丈量，導致此構想難以實行。其次，根據日令二十六號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持有墾照的墾戶大可向政府辦理重登記，於許可期限內將土地墾熟，換發所有權狀，不必屈居在緣故關係地的名下。第三，尤為重要的是，李氏對林野調查的界定與其對日令二十六號的討論相抵觸；當他強調林野調查的目的不在於將大批林野收奪為官有地，而是透過緣故關係地的設計，以放

(70)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41。

(71) 同上註，頁 42-43。

領予各利益關係者時，他就必須說明：為何在日令二十六號公佈之後十餘年，仍然有 179,988.3442 甲（保管林 172,912.7423 甲＋開墾拂下地 6212.7361 甲＋預約賣渡地 862.8658 甲；參考表四）的土地未能獲得權利延續？並且，若李氏的界說正確，緣故關係地裡的預約賣渡地應該比例最高才是，但表四顯示不是如此。準此而言，難道緣故關係地全是墾戶的無心之過或一時失察的結果嗎？

在資本主義化論的視角下，針對緣故關係地的分析每執著於財產權——而且是私有財產權——的面向，換言之，論者只以日令二十六號第一條為分析對象，在假定殖民政府就林野利權的分類是官有與民有的零和關係後，不免將「殖民政府對官地內其他權利的延續」予以忽視（如矢內原）或功能性的理解（如李文良）。避免前述盲點的關鍵一則是澄清每類緣故關係地的起源，另則是正視日令二十六號呈顯的分類架構。參照表三，墾照失效的情形應是預約賣渡地的成因，清朝所謂的私墾——日治時期的無斷開墾，則是開墾拂下地的成因，<sup>(72)</sup>但佔比例最大（96.07%）的保管林，其起源為何？權利內涵又是什麼？單就「無礙森林之保護繁殖，從事林產物採取等經濟利用」的定義來看，保管林的內涵似乎與另兩類緣故關係地互異。

誠如李文良所言，關於保管林之起源、運作情形的相關史料並不多見；<sup>(73)</sup>所幸，目前臺灣大學實驗林即日治時期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以下簡稱演習林）至今仍有保管林的設置，此現象提供了豐富的資訊以補充史料的不足。演習林最初是由東京帝大農學院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自臺灣總督府接過 67,620 町步的官有林而成立；<sup>(74)</sup>明治四十三年（1910），演習林開始編製施業案；內容載有：

本演習林之第一區中接鄰部落部份，有各種竹林約一千二百町步，大部分被在地居民所佔有，似按過去之慣例依特賣方法管理。此次計畫特加以整理，先決定交付原佔有者保管，雖然如此委由佔有者為保護管理者，

(7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頁 5。

(73)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47。

(74) 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頁 126-128；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概要》，頁 2。

似不能達成林相改良之目的，故須逐漸改為直營。<sup>(75)</sup>

大正五年（1916）的〈臺灣演習林整理案〉又指出：

竹林產物方面，過去採用特賣之法；至明治四十三年時比照臺灣總督府實施之保管林制度，設定保管竹林制度，將竹林分筆准委關係住民保管，徵收保管收益費。<sup>(76)</sup>

保管竹林的認定是令佔有者提出佔有區域報告，並在保正與佔有者共同在場的情形下估計面積與樹種，以此計算佔有者應付給演習林的租金，其後即發給佔有者保管證，允其在保管的名義下使用之。由於保管證未註明期限，保管者又未在其後的官有林野整理事業中獲得所有權，戰後依序接收該區森林管理權的林產管理局與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也就遵循此一體制，換發中文保管證予保管者。因此，這批保管林主至今仍按面積向臺大實驗林管理處繳交租金。

由於演習林的經營系統係獨立於殖產局之外，前述過程並不宜類推至其他區域；不過，演習林既然可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比照總督府的保管林制度，顯示此制度在李文良所指的大正二年（1913）前便已存在。<sup>(77)</sup>事實上，除了演習林外，目前可自史料中發現的最初記錄，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於嘉義、南投兩廳內成立的 1,054 甲保管林。<sup>(78)</sup>其後，大正元年（1912）七月民殖二九二二號「林野調査ノ結果ニ伴ヒ處分ヲ要スル林野行政事務取扱方決定ノ件」發佈，清楚界

(75)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施業案（1910 年六月制定）〉（南投：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藏，1910），無頁碼。

(76)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整理案（大正五年編）〉（南投：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藏，1916），頁 19-20。

(77) 這也就是為何在臺灣總督府內務局，《臺灣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26），頁 284-285 裡會出現「保管林」與「保管林外」兩種類別。李氏雖察覺這兩種類屬的存在，但僅是點出此現象而未加深究；參考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 136。關鍵處在於：保管林並非是在大正二年（1913）才成立，而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便已施行的制度。大正二年總督府將保管林正式化後，之前設置的部份稱為保管林外，之後則稱保管林。

(7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の林野》，頁 19-20。這片竹林即是日後爆發竹林事件的關鍵地帶。由此看來，該地區非但不是矢內原所言的政府動用強權予以沒收的個案，同時也非如梁華璜所言的日人掠奪臺灣林地的開端；相反的，就殖民政府的角度，這倒是讓「土地人民歡喜」的「德政」。內地林業界的相關討論參考大日本山林會，〈斗六の模範竹林經營著手〉，《大日本山林會報》312（明治 41 年 11 月），頁 39-41。

定保管林主的權利內涵。該法規規定保管林主須在：1. 不妨礙森林之改良與繁殖、2. 按期繳交租金、3. 只有在繼承時方能將保管權加以讓渡與貸渡的前提下，依據敕令三一—號的規定採取樟樹以外的林產物。<sup>(79)</sup> 民殖二九二二號透露出保管林與林產採取的相關性，並且，殖民官員論及保管林的時機，常是討論該制對林產處分的影響而非林地使用。<sup>(80)</sup> 保管林實為規範地緣人民之林產採取行為的制度，而不是李文良著墨甚深的林野開墾。回到表一顯示的林野分類架構，保管林仍在試圖將部份的 A 抽離出來放進 B 的類別，可說是民殖二七八號的進一步制度化。

不過，保管林的施行是否意味著殖民政府就人民林野利用慣習的順應開端？並不盡然。嚴格意義下的順應係發生在敕令三一—號公佈時，允許地緣人民若基於生計需要採取薪炭材，得比照資本家以特賣為之。此法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後逐漸發生問題。眾所周知，當時臺灣一般行政區裡最顯著的現象，允為糖業的蓬勃發展；<sup>(81)</sup> 平地的糖與山地的樟腦，並稱兩大關鍵產業。然而，製糖需要木材以為燃料，樟腦更須足夠的原料來源；<sup>(82)</sup> 為便利下游產品的製成，總督府所定的木材標準單價並不高，因為關係殖民地利潤的是產品而非原料。<sup>(83)</sup> 前述權宜之計加上刻意壓低的材價，一方面讓資本與地緣人民同蒙其利，另一方面卻造成雙方就木材的爭奪與森林保安功能的衰退，<sup>(84)</sup> 如明治四十三年（1910）十一月以民殖三五三五號通達的「蕃地取締ニ關スル件」，指出因製糖事業與其他木材燃料的需要激增，導致森林濫伐；此雖是「需給上不得已之事」，但若放任現狀，「前途頗為寒心」。<sup>(85)</sup>

在這個意義上，保管林讓地緣人民繳交租金後採取林產物的做法，是為敕令三一—號做出增補；意即，一旦保管林成立，地緣人民再也不能無償採取林產

(79)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臺灣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140-142。

(80) 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7），頁 73-74；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野事務主任會議議事錄》（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9），頁 37-44。

(81)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60-61、63-64。

(82)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頁 106。

(83) 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一卷，頁 73；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の林野》，頁 11-12；

(84) 山崎嘉夫，《臺灣造林法》（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13），頁 152-153；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臺灣樟腦專賣志》，頁 103-115。

(85)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臺灣林野法規》，頁 52。

物。<sup>(86)</sup> 然若我們將保管林放回當時林產處分的制度中理解時，又可發現該制的用意並不單純。當時，規範官有林產物採取的主要法規是「官有森林原野產物賣渡規則」，規定官有森林主副產物的賣渡可分特賣與標賣：前者依敕令三一號以隨意契約辦理，標賣者則按會計原則的程序處理；只是，除了漂流木等特例是以標賣為之外，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特賣。<sup>(87)</sup> 並且，明治四十三年（1910）該令又行修正：達伐採期之林產物賣渡予具林業經驗且擁有相當資產者時，得以特賣之法辦理。<sup>(88)</sup> 在這個意義上，若我們將規範資本家的法規與保管林相比較，即可發現兩者差異在於林產價額的計算基礎；特賣制的基礎為搬出材積，只要業者搬出材積之價值不超過二百圓的法定限額，伐採區域由其自行決定。然而，保管林科徵租金的依據是人民的佔有面積（平均每筆 1.3571 甲），若人民越出政府劃定的界線採取林產物，其保管權有被政府取消的危險。準此而言，殖民政府對地緣人民與資本家的態度差異是相當明顯的；若以較誇張的方式總結保管林的功能，那就是政府對臺灣林野慣習的順應，係以地緣人民自林產採取中獲利的可能性為代價。<sup>(89)</sup>

前述比較扣聯相關研究成果，帶給我們什麼樣的邊區圖像？李文良指出，臺灣林野利權是依據「官方支配力」與「緣故關係」兩項座標重編的：最近蕃界處是因隘勇線推進而得的包容地，官方支配力最強而貸渡或賣渡予資本家經營。其次是資本額較裕的本島資本家，由於官方的支配力較弱，且恃自清朝取得的許可，獲得第二層土地。最外層則是零細、最無資本的地緣人民，緣故關係最強。<sup>(90)</sup> 資本家受明治二十九年（1896）後的林野新規範，人民則受保管林制度的制約；前述分層的邏輯，李氏頗認同若林正文的看法，係立基在「邊區統治」的考量。<sup>(91)</sup>

(86) 不著撰人，〈林野調查及保管林業事務概要〉，無頁碼。

(87)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臺灣林野法規〉，頁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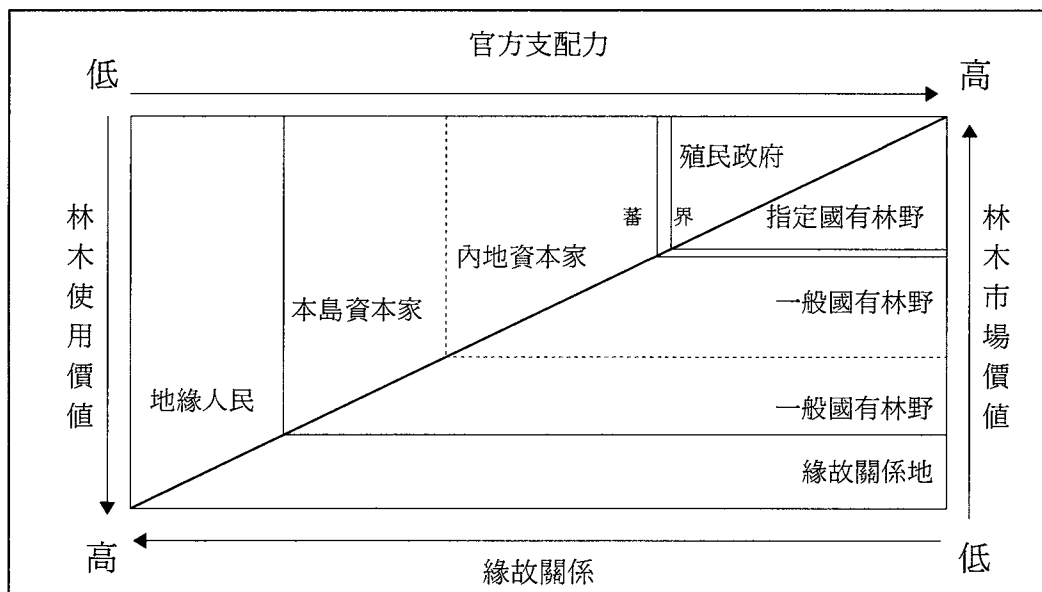
(88) 同上註，頁 52。

(89) 但不可否認的，保管林有著除了繼承之外不得轉移的規定；基本上也保護保管林主不至於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

(90) 陳國川就雲林平原地區的研究亦顯示緣故關係與官方支配力在土地利權分配過程裡的作用力；參考陳國川，〈日治時代雲林官有原野的土地開發〉，《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3（2000 年 11 月），頁 26-27。

(91) 若林正文，〈總督政治と臺灣土著資産階級——公立臺中公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5）〉，《アジア研究》29: 4（1983），頁 1-41。李文良對該文的引用與討論參考〈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 112-114、138。

筆者同意以統治為考量的分析，只是，在細究保管林與林產採取間的關聯後，顯示有必要再增添一項座標，也就是這些空間立基的「自然」與其市場價值。李文良所繪之自內而外的三層夾心，放在臺灣的林野裡實為上下堆疊的蛋糕狀（圖二）。<sup>(92)</sup>意即：最底層的地緣人民，在保管林的規範下，僅能在一定區域內採取竹材與薪炭材維持生計；中層的資本家則依敕令三一號的規定，以低廉的標準單價為基礎，以材積為計算單位，或者將林產物用來協助糖業與樟腦業的運轉，或者從事伐木事業。因此，李氏筆下的三層空間並非均質，而是有著不同的市場潛能，統治穩定的政治考量仍有差別待遇的經濟邏輯貫穿。進而，在進入蕃界後，殖民政府對資本的態度又有了轉變；尤其在阿里山、棲蘭山與八仙山等「無盡藏美林」發現後，總督府在理蕃、「避免珍貴之檜木林盡為資本獨佔」等考量下，即便內地對官營林場的做法已有批評之聲，還是將前述地域收為官營。<sup>(93)</sup>在空間區



圖二 日治初期臺灣山林利權的分配架構

資料來源：修正自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127，圖5-1-1。

(92) 李文良，〈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頁164。

(93) 總督府與藤田組在阿里山事業裡的對抗，林業方面的史料大多語焉不詳；惟《理蕃誌稿》，第一卷曾載：在著手阿里山開發之前，移交與藤田組經營的巒大山造材所，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有工人遭到



劃上，官營林場屬於「指定國有林野」的範圍，由林產部門管轄；資本家施業的地域則稱為「一般國有林野」，受林政部門規範。在伐採量的控制上，官營林場係依據「指定商主義」；首先由內地與臺灣各指定商在年前向各林場締結年度契約，林場再據此決定伐採量，林木伐出後，由指定商自行將官營材搬至市場覓售。<sup>(94)</sup> 官營林場的經營以林木的市場需求為考量，與民營業者採取的拓殖經營頗有差異。

除了剝奪反抗論者外，矢內原與李文良均正視林野調查中緣故關係地的角色，然他們關切的不是私有財產權的完整即是官民有林野的明確區分，因而忽略緣故關係地的異質性與其他林野權利的延續。透過史料的發掘與目前仍留存在臺灣森林中的制度「遺跡」，不難發現允為緣故關係地之主要類屬的保管林，其成立既涉及殖民政府的「善意」<sup>(95)</sup> 以及日令二十六號公佈後舊慣與新規難能接合的問題；另方面，人民獲得的權利相當有限且與政府規範資本的制度大相逕庭。基本上，林野調查完竣之際以林地與林木為軸線的制度架構仍然未變，只是，該架構已逐漸確立為圖二所示的分層邏輯。這個意義上，當大正四年（1915）總督府理蕃事業初成、殖民者的目光終可安全凝視這片廣漠許多的地景時，前述分層邏輯又將在官有林野整理中面臨何種變動？不同分層間的邏輯又會產生何種關係？如下所述。

---

識首。原因在於：「〔該造材所之〕林業夫與蕃人狎近，以少量物品換取多量之蕃產物；若蕃人不肯則暴力相向，甚至私通有夫之蕃婦，引起蕃社怨恨。」阿里山的鄒族與棲蘭山一帶的泰雅族又是總督府理蕃政策著墨甚深之處，前揭因素均讓總督府對此資本的行為格外謹慎。參考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誌稿》，第一卷，頁 601-602、728-730。只是，取消藤田組經營權利且低價收買其設備的總督府，由於內地對政府大規模介入森林事業的做法已心生不滿，其經營面對相當大的外界壓力。例如，明治時期的大阪日報便曾以「阿里山經營失敗」之聳動標題，譏諷總督府自藤田組處撿到便宜，卻無力擴展其業務；相關討論參考大日本山林會，〈森林經營に就て〉，《大日本山林會報》306（明治 41 年 5 月），頁 38-40；〈阿里山森林官營〉，《大日本山林會報》313（明治 41 年 12 月），頁 56；〈阿里山經營成績〉，《大日本山林會報》387（大正 4 年 2 月），頁 51-52；〈阿里山經營失敗〉，《大日本山林會報》387（大正 4 年 2 月），頁 52-53；鮑田生，〈更に阿里山問題を講究せよ〉，《大日本山林會報》324（明治 42 年 11 月），頁 22-28。反觀八仙山，該區森林在發現時北臺灣的三井會社一度想申請特賣，亦為總督府否決。大正三年（1914）的《臺灣日日新報》有著一系列關於八仙山該如何經營的討論，參考〈臺中蕃界大檜林〉，《臺灣日日新報》4994（大正 3 年 5 月 8 日）；〈八仙山の真相〉，《臺灣日日新報》5042（大正 3 年 6 月 27 日）；〈八仙山伐木之計畫〉，《臺灣日日新報》5129（大正 3 年 9 月 24 日）；〈檜材統一計畫〉，《臺灣日日新報》5187（大正 3 年 11 月 26 日）。

(94) 臺灣總督府營林所，《臺灣材》（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所，1932），頁 24、27-31。

(95) 這是李文良的用詞，參考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頁 35。

## 四、官有林野整理與民有林野的成立

官有林野整理事業起迄於大正四至十四年（1915-1925），包含區分與處分調查兩部份；前者創造了「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存置」為保留之意）的類屬，惟定義於事業前後略有差異。在明治四十四至大正三年（1910-1914）的「前調查」或「假整理」中，僅有要存置林野的規定，<sup>(96)</sup>但在正式的官有林野整理中，依據的「林野整理事務處理規程」已賦予原先僅指涉保管林與緣故地的「不要存置林野」更廣泛的內涵（區分判準如表五）。區分調查共計分出要存置林野 319,294.3729 甲與不要存置林野 398,540.7955 甲（表六），處分調查則完成 266,398.6366 甲土地的處分（表七），收入總計 5,892,387.23 圓，足支付事業開銷且益於總督府財政。<sup>(97)</sup>

從矢內原的資本主義化論視之，林野調查事業裡緣故關係地的設計，造成殖民政府將臺灣林野產權予以明確化的障礙；因此，官有林野整理相當於林野調查的「補遺」，目的即在消滅此類型土地，將之放領與人民所有。如此一來，資本便可合理且平穩地集中這些民有林野。然而，前述過程造成「官有林野所剩無幾」的局面，資本主義若要進一步發展，勢必將腳步推進蕃界。相較之下，剝奪／反抗論者對官有林野整理的解釋就略顯粗糙，除了涂照彥強調總督府將原本即屬人民所有的林野查定為官有再放領予民有的迂迴做法是在牟取地租、侵害私有財產，<sup>(98)</sup>以及梁華璜暗示總督府之所以放領緣故關係地係源自人民反抗、且各筆放領地被限縮至最小的做法是延續總督府掠奪臺灣林地的企圖之外，<sup>(99)</sup>剝奪反抗論者還是站在（或者說曲解）矢內原的基礎上而未對該事業在資本主義化中的定位提出更圓滿的歷史解釋。

然而，就主張合理／合法化論的李文良而言，官有林野整理不啻是其觀點的最佳表徵；首先，不要存置林野的判準包括明治二十九年（1896）以來的林野新

(96)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61。

(97) 同上註，頁 277-278。

(98)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 41 與註 39。

(99) 梁華璜，〈竹林事件探討〉，頁 281-282、284-285。

規與緣故關係（即表五），而不要存置林野又在官有林野整理中遭到放領，因此獲得土地的不僅是緣故關係者，也包括在隘勇線推進過程中積極搶占官有地的資本家。官有林野整理其實是為明治二十九年（1896）以來的林野拓殖完成合理／合法化的手續。<sup>(100)</sup> 其次，若某塊林野實具有被劃為要存置林野的資格，但可能已被資本家或人民圈佔，官有林野整理會將該塊林野放領予佔有者，政府日後若要收回，勢必有所困難。<sup>(101)</sup> 在這個意義上，合理／合法化反造成林業近代化的障礙。<sup>(102)</sup> 第三，如同矢內原，李氏亦認為官有林野整理造成「官有林野所剩無幾」的局面，但他不認為這是資本積累的障礙；從合理合法化論的角度來看，總督府之所以在官有林野整理完竣後繼續推動森林計畫事業，目的不在於讓「資本征服臺灣全土」，而是建立一套以要存置林野為主體、以保育為基調的林業體系。<sup>(103)</sup>

表五 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區分判準

要存置林野	不要存置林野
1. 據「臺灣保安林規則」第一條各號規定者	1. 依「臺灣官有森林原野預約賣渡規則」、預約賣渡或預定存置許可者
2. 現行官營施行林野及其預定林野	2. 依「臺灣官有財產管理規則」、預約賣渡許可者
3. 國防用防禦營造物與其他官行營造物之必要保護者	3. 依「臺灣樟樹造林獎勵規則」許可者
4. 屬現行公用林野者	4. 依「糖業獎勵規則」第三條許可者
5. 學術上認為具特別存置必要者	5. 依「臺灣鹽田規則」許可者
6. 因地形位置等關係而利用困難、不適合民營使用者	6. 許為保管林者，另依「臺灣官有森林原野及產物特別處分令」第一條第八號之二得以處理者
7. 其他被認定具存置必要者	7. 當地人民共同放牧或採集燃料、牧草、肥料之所必要者
	8. 前項規定外而不須保留者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68-70。

(100)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 191-195。

(101) 同上註，頁 106-111。

(102) 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 115。

(103)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第六章。

表六 區分調查結果

單位：甲

州別	要存置林野	不要存置林野	總計
臺北	58,467.7033	100,107.5912	158,575.2945
新竹	18,890.4643	78,135.0380	97,025.5023
臺中	86,637.8510	81,711.8842	168,349.7352
臺南	89,328.3535	82,971.7688	172,300.1223
高雄	65,970.0008	55,614.5133	121,584.5141
總計	319,294.3729	398,540.7955	717,835.1684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280。

嚴格來說，矢內原與李文良對官有林野整理的理解相當一致，只是分從資本主義化與近代林業的終點逆推；支持他們如此逆推的證據是：官有林野所剩無幾。基本上，這種「所剩無幾論」自矢內原於昭和四年（1929）提出後，七十年來已成為臺灣林野研究者的常識：即區分調查完成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的區分，其次將後者予以放領。<sup>(104)</sup> 現假設所剩無幾論的邏輯成立，表六的不要存置林野（398,540.7955 甲）就會包含表七各項土地的類屬。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將《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西部各州的資料整理如表八，所得結果是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的區分判準正如表五，且兩種林野的總和也與表六大致相符，顯示筆者的整理無誤。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比較表七與表八之不要存置林野的內容，即可發現 266,398.6366 甲的放領地並不是從 397,940.7955 甲的不要存置林野裡取出。單以保管林此一類別為例，表七顯示被放領的保管林達 192,837.8767 甲（保管林 134,526.5718 甲 + 保管林外 58,311.3049 甲），表八卻顯示保管竹林僅 5,635.1386 甲（要存置林野的保管竹林 2,861.5918 甲 + 不要存置林野的保管竹林 2,773.5468 甲），其中還有 2,861.5918 甲屬於要存置林野。這具體顯示所餘不多論將「表六的不要存置林野減去表七」的理解並不正確；表六的不要存置林野 398,540.7955 甲，理當是處分完表七之 266,398.6366 甲的剩餘。從常識上想，前述數據的出處——《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既為一本成果報告，怎麼可能會列出一種要讀者自行將不要存置林野減去放領土地的數字？

(104)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20；李文良，〈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頁 111。

既往研究對數據的詮釋有誤，我們有必要對「官有林野整理到底清出什麼」予以重新解釋。回到表七：首先，總計 192,837.8767 甲的保管林與 12,001.0921 甲的無斷開墾地藉由處分調查放領予佔有人。保管林的意義已如前述，是政府允許讓人民採取林產物的區域。無斷開墾地則特指林野調查之際發現的私墾地，依據敕令三一號第八條第二款將之放領。其次，表七尚有一個稱之為「無斷開墾地拂下」的類屬（面積 303.4311 甲），其意義是土地調查時查定的無斷開墾地，同樣依據敕令三一號予以放領。<sup>(105)</sup> 第三，78,706.0961 甲的「預約開墾成功賣渡地」係根據「官有林野預約賣渡規則」或「官有財產管理規則」等法規，申請人完成制度要求後予以放領。然而，關鍵是，儘管有這麼多土地依據不同的規定將官有林野放領予佔有者與申請人，官有林野仍保有相當數量；誠如表八顯示，尚有 397,940.7955 甲的林地，或因申請人尚未達到放領資格，或因其依據的法規根本不是一類林野放領法規（如年期貸渡許可），而維持在官有狀態。

扣回矢內原與李文良的論證，兩位作者儘管在計算上有些瑕疵，但基本的視角是正確的。只是，前者強調殖民政府將緣故關係地此曖昧不明的類屬予以明確的企圖，因而忽略除緣故關係地之外，尚有 78,706.0961 甲的官有林野也在放領之

表七 處分調查及其成果

	放領筆數 (筆)	放領面積 (甲)	放領代金 (圓)	每甲平均代金 (圓)
不要存置林野				
保管林	130,270	134,526.5718	3,320,579.650	24.68
保管林外	94,255	58,311.3049	1,576,919.030	27.04
無斷開墾地	33,728	12,001.0921	531,060.160	44.25
廢川區域內新生地	152	73.8290	31,304.580	424.01
預約開墾成功賣渡地	—	78,706.0961	971,366.240	12.34
無斷開墾地拂下	1,056	303.4311	50,472.570	166.34
拂下取消				
不要存置林野	21,264	17,165.3700	588,588.210	32.29
無斷開墾地	1,168	358.3184	20,433.290	57.03
總計	—	266,398.6366	5,892,387.23	22.12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278、285-290。

(105)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285、288。

表八 西部各州要存置與不要存置林野的次級類屬 單位：甲

要存置林野		不要存置林野	
保安林	80,174.4999	預約賣渡許可地	74,108.1235
保安林預定地	56,438.6162	樟樹造林許可地	23,393.3436
官行施業地	96,764.4869	依「官有財產管理規則」	1,027.4502
		預約賣渡許可地	
年期貸渡許可地	6,468.1628	依「糖業獎勵規則」許可地	2,017.4802
保管竹林	2,861.5918	預定存置許可地	3,306.3340
其他	76,587.0153	依「鹽業獎勵規則」許可地	435.9898
		年期貸渡許可地	3,761.8307
		保管竹林	2,773.5468
		其他	287,116.6967
總計	319,294.3729	總計	397,940.7955

說明：對照表六可發現不要存置林野的面積少了六百甲；經逐筆對照各州數據後，發現頁 298 所列之臺中州東勢郡石岡的數據為誤差來源。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頁 298-300、322-323、340-341、371-374、405-407。

列（參照表七）。後者關切政府藉由官有林野整理合理化眾利益關係者的林野利用實態，卻失於追問：這些積極參與官有林野搶占的資本家為何在林野整理裡只獲得前述 78,706.0961 甲的林野地？此些偏狹不能不說是兩位作者在有意無意間將官有林野整理的前因後果塞進一種演化式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所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分別處理放領地與不要存置林野在二〇年代之林野事業的角色；以下即先從放領地的部分開始，不要存置林野則待下節論及。

在林野調查中交付給地緣人民保管的保管林地 192,837.8767 甲，在官有林野整理中被賦予業主權，加上在林野調查之際即已查定的 31,179 甲民有林野，構成大正十四年（1925）以降《林業統計》裡「民有林野」的基盤。<sup>(106)</sup> 對照表一的分類架構，原本隱藏在 A 之中、僅以日令二十六號難以將之抽離的林產舊慣，歷經民木製腦、民殖二七八號、保管林等制度安排，終於完成由 B 向 D 的轉換，也就

(106)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林務會議に於ける殖産局長訓示〉，《臺灣山林會報》7（大正 13 年 5 月），頁 4；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頁 108-109；臺灣總督府殖産局，《臺灣林業／基本調查書》，頁 259-262。

是官地／官木、官地／民木乃至於最終的民地／民木。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些境界清楚、權利內涵明確的民有林野，是否會如矢內原預測地向資本家手中集中？基本上，關於民有林野之面積、件數與筆數的統計資料甚少；大正年間的《臺灣林業統計書》曾列有國、民有林野登錄地的面積與筆數資料，筆者將其整理如表九。該表顯示大正十至十四年（1921-1925）間查定為民有山林原野的筆數與面積逐漸遞增，惟每筆平均面積並無大幅擴張的現象，山林維持在 1.2 甲，原野維持在 0.49 甲左右。惟前述資料於昭和年間便告闕如，我們又得發展其他指標。由於資本家取得所有權的林野不屬於《林業統計》的範圍，其土地不被納入民有林野的計算。<sup>(107)</sup> 若在林野整理完竣後，這些民有林野均流入資本家手中，面積應會大幅減少才是。附錄一列出昭和二至十三年（1927-1938）國、公與私有林野的面積（公有林野加私有林野即為民有林野），其中公有林野的比例甚小，平均在 0.45% 左右；國、私有林野的面積比例大致維持在九比一，兩者平均面積分別是 2,264,233.82 與 255,983.91 甲，十年來均無大變化。換言之，民有林野並未轉入資本家名下。這其實不難理解，林業須在一定面積的林地上經營方有規模經濟，要將每筆面積約當一甲的民有林野串連成一塊林業用地，洵非易事；矢內原似乎高估了資本的能量。

如果說民有林野的成立不致於讓資本遂其集中，那麼，此類別的林地在二〇年代的林野事業中扮演何種角色？對此，日治中期即任職臺灣高等農林學校的青木繁，似提供了一個可能答案。在《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一書中，青木繁指出：森林經營應服膺永續與財政兩原則；臺灣海拔六百公尺以下的林地屬私經濟林地，以上則為公經濟林地；私經濟林地的經營係選擇伐期短、生長快的樹種如

(107) 這是因為《林業統計》為一具特定用途與目的的統計；根據明治二十九年（1896）後各項林野新規取得官有林野的資本家，其施業若大幅更動地貌（如從事開墾），使地表不再呈現林野的狀態，該土地不被納入林野的計算範疇；若依據法規不由林務課所管，如「樟樹造林獎勵規則」係由樟腦部門、「官有財產管理規則」係由內務或拓殖部門；該筆土地也不會納入前述計算。即使是資本家取得林地以為營林之用，其土地也屬拓殖部門所管。但這並不意味資本家的活動即完全脫離林業統計的範圍；基本上，林務課關心的是，有多少官有林野移轉至資本家手中？根據的又是何等法規？但它不會在意由資本家負責經營的林地到底有多少。由緣故關係地轉成的民有林野則不同，其成立是當時林政的重要一環（詳正文）。安詮院貞熊在討論臺灣林野的分級方式時，其對私有林野的定義包括「資本家之專業造林」與「農村之副業造林」兩類。但他語帶遺憾地指出，臺灣稱不上有專業的造林家；僅臺北州的三井山林部與臺中州大寶農林部可勉強比照。安詮院的說明與前述看法似可相互參照；參考安詮院貞雄，〈臺灣林業發展の方策〉，《臺灣農事報》200（大正 12 年 7 月），頁 38。

表九 大正十年至十四年(1921-1925)民有林野既登錄地的筆數、面積與平均面積

	森林			原野		
	筆數	面積(甲)	平均面積(甲)	筆數	面積(甲)	平均面積(甲)
1921	48,586	48,056.51	0.99	76,830	36,013.57	0.47
1922	67,575	77,328.58	1.14	88,627	44,047.45	0.50
1923	100,561	116,521.84	1.16	97,429	48,163.83	0.49
1924	116,188	133,099.54	1.15	93,195	46,735.72	0.50
1925	125,907	168,293.19	1.34	98,585	47,168.62	0.48

資料來源：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務課，《臺灣林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1-1925）的林野登錄地面積之民有地一欄資料製成。

相思樹、竹林等，可快速砍伐與更新，將木材於市場售出以獲取利潤，「理論上可達財政與保續原則的兼顧」。公經濟林地則是國家須加以介入的林地，因為只有國家能以保安、整體經濟的觀點從事經營，不致於因財政收入而放棄保續原則。<sup>(108)</sup>青木繁的見解並非獨創，任職於總督府林務部門的安詮院貞熊亦主張將林野以市場為圓心劃分成同心圓，離市場越近者為私經濟林地，越遠者則為公經濟林地。<sup>(109)</sup>若我們進一步回溯內地林業近代化的歷程，即可發現將林野區分為公私且依不同原則經營，至少是十九世紀末日本已接受的林業觀念。明治十八年（1885）山林局長武井守正前往歐陸考察英、法、德國等地之林業制度後，指出森林經營應服膺經濟與財政兩原則；明治十九年（1886）林區制度確立，復將前述原則確立為「官有林—經濟」與「民有林—財政」的政策設計。<sup>(110)</sup>在這個意義上反觀林野財產權於官有林野整理後的轉變；民有林野的成立同樣是為林業的近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前提，不僅是政府基於穩定統治的考量而順應臺灣林野慣習的結果。

當然，我們也不能走到另一解釋的極端，也就是視民有林野的成立不過是近

(108) 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臺北：新高堂，1925），頁547-548。

(109) 安詮院貞熊，〈臺灣林業發展の方策〉，頁32-35。

(110) 高橋琢也，〈林區制度の創立〉，收於寺尾辰之助編，《明治林業逸史》（東京：大日本山林會，1931），頁79-81。必須強調的是，武井守正所言的「經濟」即相當於青木繁與安詮院貞熊所說的「公經濟」，應做「治理的經濟」來理解；詳見本文結論。



代林業觀念引領下的產物。既然資本主義化論對民有林野將向資本手中集中的論點已出現裂縫，我們不妨考慮其他的生產因素。基本上，日本在臺林業除了阿里山與太平山等官營林場設有若干機械設施以減輕對勞動力的需求，<sup>(111)</sup>其他的林業地，例如資本家主掌的民營伐木，不論是伐木、造材、集材與搬出都得仰賴人力為之。<sup>(112)</sup>不僅如此，造林所需的勞動力亦不容小覷。領臺初期，殖產局於臺中廳下新社庄有一筆二百餘甲的土地擬從事樟樹造林，因局員人數不足，乃與東勢角支廳達成協定，動用其下管轄的保甲苦力，每人每日工資三十錢，每日工作人次達千人之多。<sup>(113)</sup>青木繁曾估計，大正十一至十二年間（1922-1923），臺灣官營苗圃、造林等相關事業的工作人次每年達九十萬人；<sup>(114)</sup>《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則指出昭和十年（1935）後官行造林的人工亦需此數。惟當時山村人口僅三十六萬四千人，尚要徵召賽夏、阿美與鄒族補其不足。<sup>(115)</sup>如此巨大的勞動力需求，領臺初期由於蕃情不穩，多自內地運來工人以資因應；例如八仙山林場在設置初期，因當地泰雅人的抗拒以致本島人裹足不前，工人多召自奧羽、木曾、紀州、大和與九州等地。<sup>(116)</sup>又如明治三十七至四十一年（1904-1908）鹿島組於巒大山的伐木作業，亦因當地蕃情凶悍，只好以預付旅費之法高價自內地招徠工人。<sup>(117)</sup>不過，前述作法的成本過昂，不是長久之計，勞動力的供給問題還是得從「土人（包括本島人與生蕃）」身上謀求解決。<sup>(118)</sup>

自有《林業統計》以來，「林業就業者賃銀（工資）」便是個「被統計」的類屬；昭和四年（1929）以前，是項統計資料自成一類，其後便被歸為「斫伐事業及林產處分關係編」，昭和年間再列為「參考編」。觀諸工資的次級分類，首先依

(111)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林業一斑》（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1919），頁115-116。

(112)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頁300-302。

(113) 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保安林林業試驗其他ノ林業經營方針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複製收藏），無頁碼；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上）〉，《臺灣農事報》123（大正6年2月），頁17-25；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下）〉，《臺灣農事報》126（大正6年5月），頁37-42。

(114) 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頁60。

(11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40。

(116) 同上註，頁40；宮瀨浩，〈森林労働者と臺灣〉《臺灣山林會報》8（大正13年7月），頁19。

(117) 金平亮三，〈巒大山伐木事業〉，《臺灣農事報》54（明治44年5月），頁2-3。

(118) 大正三年（1914）阿里山林場採取之「革命改善」，其中一項便是本島人為主的雇傭策略。參考大日本山林會，〈阿里山經營成績〉，頁51-52。

工作性質分成土木建築、伐木造材與造林苗圃等項，各項之下再分內地人、本島人（有時還會再細分出男女）與蕃人，其後便列出工資。由附錄二可見，本島人工資約為內地人的五成至六成，而蕃人工資又是本島人的五、六成；對這種明顯依群體與工作屬性導致的工資差異，殖民政府或林業家並不避諱，反強調是「臺灣林業的競爭優勢」。<sup>(119)</sup> 不僅如此，當時林業界尚有整套論述以解釋差異的形成緣由。首先，內地人是高技巧且專職的林場工人，本島人僅是在農閒時從事兼業勞動的山村居民。進而，本島人從事的工作在體力負荷上不若農業，技術要求又不若工業。<sup>(120)</sup> 由此看來，林業若要維持相對於內地的競爭優勢，關鍵即在避免地緣人民轉變為純粹的農民或工業勞動者。

不過，臺灣林業勞工的半普羅性格，以殖民政府的說法，造成勞動力品質低落。大正四年（1915）林務課長曾於〈臺灣造林事業保安林業試驗其他ノ林業經營方針案〉內指出：本島人對造林的觀念極為幼稚，甚至有將苗木的枝葉埋入土中，根莖留在外頭此「滑稽之事」發生。<sup>(121)</sup> 前揭殖產局下新社庄的數千名勞動者，每三十至五十名便須一名監工；監工的數量龐大，又多由日人擔任，工資支出因而增加不少。為因應一九一〇年代的林野拓殖熱潮，總督府曾訓練大批以內地人為主的林業講習生，支援資本家以執行政府的造林政策。在講習生的訓練過程中，政府即傳授「土語」以為講習生與本島人的溝通管道。<sup>(122)</sup> 明治四十至四十四年（1907-1911）殖產局又以養成下級技術員為由，於農事試驗場農業講習部內增設林學科，針對公學校畢業程度的本島人施行林業初等教育。<sup>(123)</sup> 一旦監工養成教育有了一定成果，如何改善勞動力品質以為林業所用的問題更形迫切；在此脈絡下，民有林野為何在二〇年代出現實不難理解；正如明治初期的內地政府在發現

(119) 平賀正二，〈林產物拂下方法の改善と木材の金融化〉，《臺灣山林會報》35（昭和4年1月），頁51。

(120) 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頁509-513。類似的論述亦見於內地林業界。參考相原言三郎，〈森林勞動問題に對する二三の考察〉，《大日本山林會報》485（大正12年4月），頁29-44；渡邊全，〈日本の林業と農山村經濟の更生〉（東京：養賢堂，1938），頁446-449。

(121) 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保安林業試驗其他ノ林業經營方針案〉，無頁碼；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上）〉，頁22。安詮院貞熊，〈臺灣林業發展の方策〉，頁27。不過，臺灣人民儘管少有造林經驗，但是否如這些林業家所言的「無知」，值得懷疑。

(122) 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保安林業試驗其他ノ林業經營方針案〉，無頁碼；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下）〉，頁41。

(123) 參考不著撰人，〈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下）〉，頁41；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臺灣の林業〉（昭和八年版），頁157。

「林野民有否則官有」勢不可為後，明治十年（1877）起煞費苦心地透過民地／民木與官地／官木的組合定義地緣人民的林野舊慣。明治三十年（1897）農林省山林局即正式透過「國有林野地元施設」以賦予山村人民盜伐遏止、勞動力整編的營林任務。<sup>(124)</sup>由此看來，如果說林野整理在資本主義化的進程上有著一定影響，其影響也不是將人民自林中逐出以轉為無產勞工；更重要的是，設法將之安置，維持其兼業狀態。然政府對地緣人民的安置若是允其在官林邊緣從事米作與稻作，從臺灣人民對土地的「貪婪」與對森林的「不知愛惜」來看，似非上策。<sup>(125)</sup>在這個意義上，如何透過營林官員的監督、輔導，配合苗木無償發給等獎勵措施，將地緣人民改造成（與日系資本一樣的）「篤志」的林業家，成為臺灣林業近代化的重要環節。保管林、緣故關係地與民有林野等均是此意識下的產物，並且也非唯一的制度；<sup>(126)</sup>包括部份林、年期貸渡許可地等制度的推展，不但讓地緣人民可於一般國有林野中棲身，甚至在保安林裡也可發現人民的蹤跡。<sup>(127)</sup>

橫亙近十年的官有林野整理能在一九三〇年代完竣，無疑是引人注目的里程碑，但因該事業係處在林野調查與森林計畫事業間，其意圖與後果常為研究者誤解。本節嘗試說明緣故關係地的放領並未造成官有林野所剩無幾的後果，民有林野在成立後也未向資本手中集中；若我們將民有林野的成立放在當時林業的脈絡裡思考，臺灣林業的近代化係藉此奠下基石。不過，本文至此尚未論及此近代化構想的具體內容，關鍵即在於：到底在資本家活動的不要存置林野裡，發生了什麼事？

(124) 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發達過程》，頁 274。必須強調的是，該政策的推展常受限於政府預算而頻有波折。參考渡邊全，《日本の林業と農山村經濟の更生》，頁 379-383。

(125) 類似論述在林業界十分常見；舊慣調查會即視此為臺灣林野舊慣的特徵，因而主張臺灣並無類似內地入會林野（即共同所有的林野）的舊慣。參考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臺灣私法》第一卷下，頁 465-466。

(126) 內地亦有保管林的設置，其法源是明治三十二年（1899）公佈的國有林野法；參考渡邊全，《日本の林業と農山村經濟の更生》，頁 355-356。由此可見，臺灣的保管林制度不見得是如梁華璜所言的「史無前例的變通辦法」；參考梁華璜，〈竹林事件探討〉，頁 281。

(127) 杉本良，〈臺灣林業所感〉，《臺灣山林會報》38（昭和 4 年 6 月），頁 19。據《林業統計》所載：大正十四年（1925）計有 47 件 6,474.52 甲的保安林係在部份林的名義下允許人民佔有；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臺灣林業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1926），頁 9。

## 五、林產處分制度的改革與林野事業的制度化

先就世界局勢的變動視之，由於一次大戰的勃興，木材與林產品的市場大好；昔日臺灣林野的關鍵產業——樟腦，卻因歐美合成樟腦的抬頭而漸趨衰頹。<sup>(128)</sup>原本以樟腦為主軸的造林與林業方針雖大受影響，幸而林產——特別是用材生產——填補了前述空隙；<sup>(129)</sup>順此局勢，大正四年（1915）五月，敕令三一號即行修正，將林產物的搬出上限由兩百圓改為六百圓。<sup>(130)</sup>在市場景氣且制度便利的環境下，林產處分的價額急劇增加（參考圖三）；林業官員在回顧此段歷史時，常稱此為「濫給賣時代」或大正四至十年（1915-1921）的「森林濫伐之慘禍」。<sup>(131)</sup>

不過，濫伐並不是不言自明的辭彙；由圖四可見，大正十年（1921）的民營生產材積的確特高，達到 521,583 石，但大正十一年（1922）即恢復前年水平，約二十萬石左右。然大正十一年以降就不被林業官員們歸為濫伐，反稱為「格正時代」。<sup>(132)</sup>由此看來，濫伐的判準不是僅從伐採量決定，而自有其定義，對此，我們可從「臺灣森林令」的內容中窺得一二。

「臺灣森林令」於大正八年（1919）十一月以律令第十號發佈，屢被殖民政府譽為臺灣林業史上一大變革。「森林令」在制度上呈現的是「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與「保安林取締規則」的合併，同時設置具警察權的森林警察與森林主事。<sup>(133)</sup>然須強調的是，「森林令」的意義不僅是舊制度之再制度化加上警察權而已，它其實彰顯一種與「保安林取締規則」不同的山林保育觀。<sup>(134)</sup>「保安林取締規則」依據的是明治三十年（1897）內地舊「森林法」第十九、二十一

(128) 大日本山林會，〈臺灣樟腦減產〉，《大日本山林會報》459（大正10年2月），頁60。

(129) 以曾在山地引發造林熱的樟樹獎勵規則為例，大正五年（1916）後申請者幾近絕跡；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頁262-263。

(130)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領臺二十年臺灣林業之沿革並成績概要〉，頁44；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務法規〉，頁59；臺灣總督府營林局，〈林業一斑〉，頁128-129。

(131)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臺灣の林業〉（昭和八年），頁85-86。

(132) 同上註，頁86-87。

(133) 安詮院貞熊，〈臺灣森林令大要〉（臺北：著者，1923），頁7-8。

(134) 有意識地將山林保育與保安林設置放在一起討論的著作，參考 Ts'ui-jung Liu and Shi-yung Liu（劉翠溶與劉士永），「A Preliminary Study on Taiwan's Forest Reserve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Legacy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6: 1 (2000), pp. 1-34.

條的「禁止主義」——規範的是行為本身，只要是開墾、伐木、林產物採取等，不問其程度、目的與方式為何一律禁止。<sup>(135)</sup>但「森林令」延續的是明治四十年（1907）內地版「保安林取締規則」改正後的「現狀主義」：爲了保育必須對森林加以整理；只要獲得廳長允許，在不大幅更動地貌的情形下，不論開墾、林產物採取甚至皆伐，事實上均在允許之列。<sup>(136)</sup>換言之，從禁止轉爲現狀主義的環節是地貌不變與廳長意見；至於怎樣的轉變才算「地貌不變」？還得仰賴政府裁決。例如臺中廳長曾向營林局長請示「何謂森林的意義」，<sup>(137)</sup>營林局長的回復是依據大正六年（1917）六月大審院民事部對「森林法中關於森林之意義」的擴大解釋：森林的認定不拘於地目裡的「山林」而「從其現狀」，只要地表是處在「竹木林叢」的狀態，即納入「臺灣森林令」的適用範圍。<sup>(138)</sup>

從禁止向現狀主義的轉換，政府對森林的控制似乎放寬許多；但我們也要考慮到，在「森林令」公佈前，殖民政府若要對臺灣的林野予以介入，唯有將之查定爲保安林，否則無以爲之。「森林令」公佈後，只要符合前述森林定義的區域全部納入。猶有甚者，「森林令」更成立「森林犯罪」的類屬，駐紮各州廳的森林主事與森林警察，不僅可將「未經政府許可即擅入官有林野導致現狀改變者」依刑法懲治，<sup>(139)</sup>即便在民有林或保安林以外的林野內，亦可就業者的經營方式予以輔導與限制。<sup>(140)</sup>準此而言，「臺灣森林令」實凸顯一套與「保安林取締規則」相異的保育觀；此觀點的出現，意味著國家將自身塑造爲「國有林」經營的主體。「森林令」公佈的時點，見證了「官有林野」向「國有林野」的轉變。這可從統計類別的設計上看出。林業做爲一個「被統計」的項目，制度化於大正八年（1919），在此之前，對林野所有權的區辨概屬官林與民林兩類。《林業統計》將林野區分

(135) 鈴木倉太郎，〈保安林の禁伐と其損害補償に就て〉，《大日本山林會報》503（大正13年10月），頁2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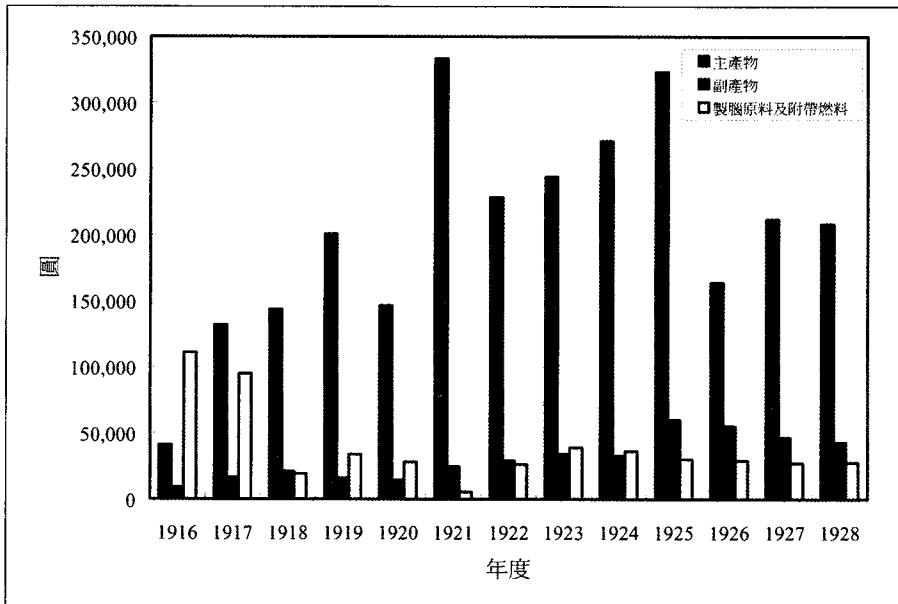
(136) 山崎嘉夫，〈臺灣森林令制定の要旨〉，《臺灣時報》3（大正8年9月），頁21-22；萩野敏雄，〈朝鮮、滿州、臺灣林業發達史論〉，頁439-440。

(137) 安詮院貞熊，〈臺灣森林令大要〉，頁20-23；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頁4-5。

(138) 參考古井辰藏，〈森林法上森林の意義に關する大審院の判決を評す〉，《大日本山林會報》422（大正7年1月），頁43-47；安詮院貞熊，〈臺灣森林令大要〉，頁24；渡邊全，〈日本の林業と農山村の經濟更生〉，頁351-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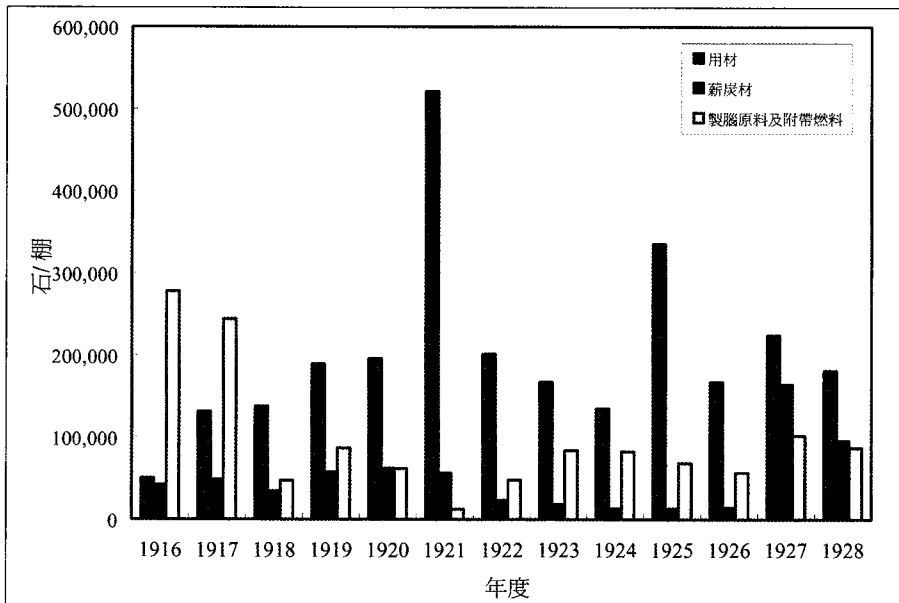
(139) 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頁56-58。

(140) 山崎嘉夫，〈臺灣森林令制定の要旨〉，頁21；安詮院貞熊，〈臺灣森林令大要〉，頁5-6、72-73。



圖三 大正五年至昭和三年(1916-1928)國有林產物處分價額

資料來源：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頁 97-98。



圖四 大正五年至昭和三年(1916-1928)民營伐木生產材積

資料來源：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附錄三。

成國有、公有與私有三類；此分類與「森林令」公佈時機若合符節，不見得是一個巧合。回到內地林業的脈絡，明治三十三年（1900）內地「森林法」將原先的官林、官有山林與官有原野合併，以「國有林」稱之，明定經營單位為中央的農商務省山林局。<sup>(141)</sup> 臺灣森林令雖未有類似明文規定，但就林業官員屢將兩者相比的情形看來，我們有理由懷疑，森林令亦具備類似的功能。<sup>(142)</sup>

之所以將官林與國有林的區辨帶進討論，目的不在於類型學的吹毛求疵；臺灣官有林野的成立係根據日令二十六號第一條「非具官方憑證者，算為官地」而來，只有「森林令」才認可國家應對國有林進行廣泛且全面的介入。在這個意義上反觀一九一〇年代的國有林經營，前述理念恰與資本家的施業方式相抵觸。首先，由於官有林野整理仍將部份資本家擱置在不要存置林野內，也就是此些土地上的林木仍屬國有，一但搬出上限改為六百圓，資本家的伐採區域更形擴大。<sup>(143)</sup> 第二，在木材市價看好之際，總督府訂下的木材標準單價依然不高，資本家只要拿準時機，大有機會牟取市價與標準單價間的差額利潤。<sup>(144)</sup> 第三，在營利動機的驅使下，資本家的作業往往是在伐採區域內搜尋良材，將之伐倒搬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前述做法一方面造成造林作業的困難，「植伐跛行」無法達成林相更新，<sup>(145)</sup> 另方面，政府更介意的是，身為國有林的擁有者，既難能規範資本又僅分得國有林經營的少數利潤。

從制度的層次觀之，政府並未坐視此情形繼續發生；大正十二年（1923）二月，訓令第二十四號「官有林野產物處分豫定案編成規程」公佈；同年十一月，總督府另以總殖二三三二號公佈「林產物賣渡價格查定書、資材價格算出ノ方式、企業利益率及金利率ニ關スル件」，列明林產物的價格計算公式如下：<sup>(146)</sup>

(141) 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發達過程》，頁 14、17-18。

(142)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臺灣の林業》（昭和八年版），頁 66；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頁 451。

(143) 安詮院貞熊，〈臺灣に於ける國有林產物買賣の史的考察〉，《臺灣山林會報》9（大正 13 年 9 月），頁 23-24。

(144) 同上註，頁 25-26。

(145) 同上註，頁 21。

(146)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務法規》，頁 85、87-88。

$$\text{林產物價格} = \frac{\text{市價}}{1 + \text{企業利益率} + \text{金利率}} - \text{經費}$$

若林產物屬用材類，則上述公式的右手項須乘上「步合」，即所謂「利用率」，也就是生立木轉為木材的比例。企業利率規定為百分之十，利率為百分之十二。經費係指資本家投入林產事業之資產如伐木造材、搬運、架設工寮與設置道路等設施的查定價。<sup>(147)</sup> 在前述公式公佈後，林產處分將不是如先前般地，以搬出價額來調控資本的施業，而是在調查森林林況、林木株數、樹種等資料後，編製伐木計畫。其次，由資本家興建相關伐木設施，交由辦務署查定各設施的現金價。第三，將林木市價乘以生立木材積，並將之折現。第四，此金額扣除資本家的投資，即是資本家伐採國有林所須支付的代價，也就是前式中的林產物價格，時稱「樹代金」。第五，若扣除金額後的數值呈現負數，表示資本家投資金額大於該區森林折現後的價額，政府會將一定面積與材積的森林「償卻」給該資本家，允其有優先伐採該區森林的權利。<sup>(148)</sup>

前述制度取代了領臺以來的「申請一賣渡」之法，以達林產處分的「公正、利用與集約」；<sup>(149)</sup> 據當時林業家的說法，訓令二十四號與總殖二三三二號公佈後，臺灣的林產處分始進入「格正時代」。<sup>(150)</sup> 進而，前述改革亦促成資本家、政府與森林間關係的重構。在原先的「申請一賣渡」之法中，每次林產處分即相當於政府與資本家在某時點的買賣關係。但在大正十二年（1923）以後，林產處分因伴隨著償卻制度的設計，當資本家大力修築固定設施以開採森林時，一方面固定設施的成本已自國有林的售賣價額中扣除；另一方面，若固定設施成本過昂，國家也會為其保留固定設施鄰近森林的優先處分權利。這些面向均保障且誘導了資本對林業的長期投資。<sup>(151)</sup> 第三，林產處分的改革也不僅是為資本家的利益著想而已；筆者將圖三的「主產物」與圖四的「用材」各年度數值相除，即總督府將國

(147) 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頁 520-5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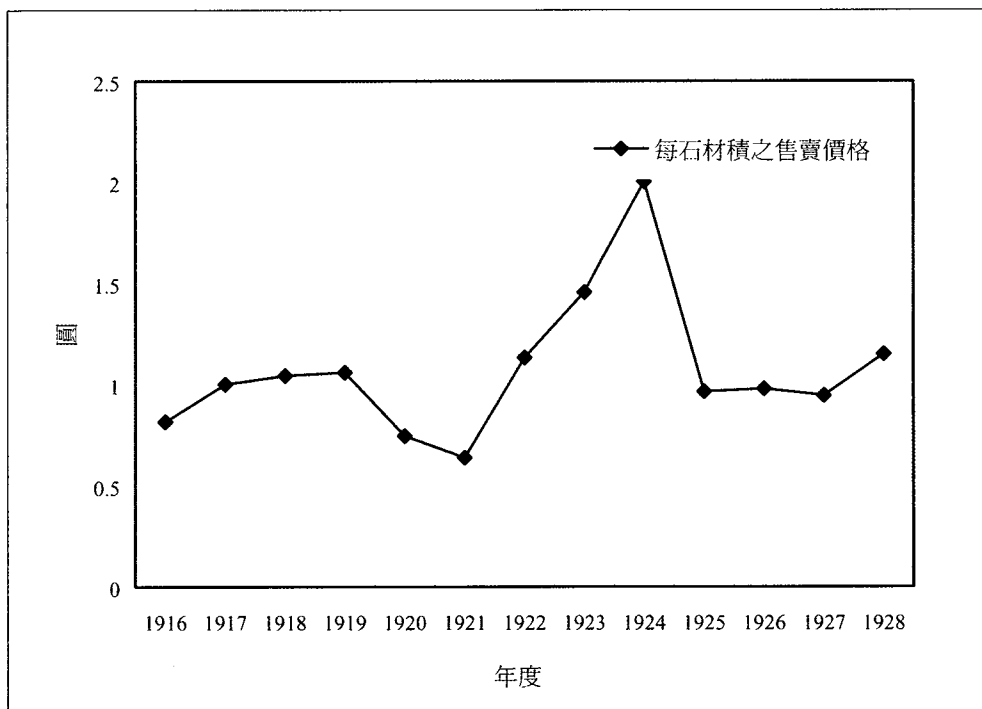
(148) 張中和，〈臺灣之林產物處分〉，《臺灣銀行季刊》16: 1（1965 年 3 月），頁 31-32。

(149)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 51。

(150)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臺灣の林業》（昭和八年版），頁 86-87。

(151) 若以戰後林業界的術語，此即資本家與該片森林間的「緣故關係」。曾昭鉅，〈談林產處分上之「緣故關係」〉，《林產通訊》9: 2（1950 年 5 月），頁 6-7。





圖五 大正五年至昭和三年(1916-1928)國有林售賣價額估計

資料來源：逐年將圖三之主產物價額除以圖四之用材類材積而得

有林產物處分予資本家經營的總價除以資本家生產的用材材積，以約略估計各年度的國有林售賣價格。由圖五可見，大正十年（1921）的處分總價與用材材積雖創下新高，林木每石售價竟不足一圓，在林產處分改革後的大正十三年（1924），每石售價即提升至兩圓。從政府的角度看來，處分制度的改革在國有林經營利潤的提升上，實有成效。<sup>(152)</sup>

然而，我們也要考慮到，前述兩全其美的局面還須仰賴一定的物質與知識條件。首先，森林國有須是森林經營最重要的前提，否則國家自無分享經營利潤的正當性。其次，國家也不能只是森林的擁有者而已，還須對其擁有的森林有著一定程度的瞭解，至少，它要能確定何處的森林該伐、何處又該償卻予資本家。在

(152) 安詮院貞熊即是以此法估計林產處分改革後的成效，結論是 0.924 提升至 1.052 圓。惟安詮院的數據不知從何而來，故本文參考較明確的統計資料重新估算；參考安詮院貞熊，〈臺灣に於ける國有林產物買賣の史的考察〉，頁 24-25。萩野敏雄也指出林產處分改革確有增加國家收益的顯著成效；參考萩野敏雄，〈朝鮮、滿洲、臺灣林業發達史論〉，頁 420。

前述考量下，自一九二〇年代開始，總督府即發動一連串不同名目的森林調查事業；從作業計畫調查、森林治水調查乃至於森林生長量調查，<sup>(153)</sup> 在查明各區森林之構成、面積、蓄積與價值之後，進一步擬定伐木作業的搬出計畫、推估資本家的固定與流動投資以及國有林償卻予資本家的代價與時間。<sup>(154)</sup> 尤其在大正十一年（1922）全島森林生長量調查完竣後，<sup>(155)</sup> 總督府首度在經驗上證實臺灣的森林確呈遺利甚多的狀態，只是森林的枯死率實大於生長率，林木若不儘速搬出利用，難保遺利不會化為枯木。<sup>(156)</sup> 大正十二年（1923），殖產局長喜多孝治即在全島勸業會議提出「集約利用」的林業方針；<sup>(157)</sup> 配合前述處分制度的改革，政府得安排資本家著手砍伐枯死量已高於生長量的森林區域，森林的保育與生產功能似可兩全。

由於世界局勢與制度法規的變動，日治初期主導林野事業的拓殖經營一改舊觀，取而代之的是林產與伐木事業。然而，奠基在拓殖時期的舊制度並不能完全符應新局勢；在「森林令」公佈後，資本家在官有林野的施業一方面被歸為濫伐，另方面與當時保育的觀念相抵觸。大正年間，總督府迅速擬妥因應之道，在對林產處分進行改革後，不但確立國家之於國有林野的經營權力，更牽涉到國家與資本間關係的重新界定。扣回前節論證，我們可說官有林野整理確定了圖二所示的空間整編與利益分配邏輯，轉化為國家——要存置林野、資本家——不要存置林野的安置；惟須強調的是，這兩類林野事業的展開，仍賴民有林主在勞動力素質、林業知識等面向的提升才行。在這個意義上，稱一九二〇年代為臺灣林業經營的制度化時期，或許不失允當。然弔詭的是，就在此段時期另種論述卻逐漸浮現，論者不僅挑戰當時林業的經營成果，甚至以「臺灣之恥辱」稱之；就歷史解釋的面向而言，前揭互競的論述更涉及當「官有林野所剩無幾」不足以仰賴後，森林計畫事業是如何且為何實現等問題，如下節所述。

(15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頁15-16、18-20。

(154) 例如《濁水溪上游治水報告書》雖是以「森林治水調查」為名目；但第十一章「森林ノ伐採利用」即指出：該區林木每尺締的市場價值為9.5圓，須以十年的時間（年利0.5圓）以償卻資本家之固定投資；參考臺灣總督府營林局，《濁水溪上游地域治水森林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1920），頁71-82。

(15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主要林木生長量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22）。

(156)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72-73。

(157) 伊藤太右衛門，〈臺灣明日の林政〉，《臺灣山林會報》7（大正13年5月），頁11-12。

## 六、林業經營的危機與森林計畫事業

先自前節論及的林產處分算式說起。該式顯示森林現金化的重要基礎為木材市價，此舉讓林野事業進一步與市場緊密相連。一旦木材市價看好，資本家投資林產業的意願較高。<sup>(158)</sup>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將官營材於嘉義、臺中與羅東等木材市場上的價格製成圖六，從而推估用材市價的變動趨勢。<sup>(159)</sup> 由圖六可見，用材市價於大正九至十年（1920-1921）攀上高峰後（67.69 與 66.93 圓），隨即跌至 37.05 圓；大正十三年（1924）略有回升，其後仍維持下跌。這種變動趨勢意味著，當資本家以某時點的市價為基礎繳交樹代金且著手砍伐後，待木材搬至市場求售時市價已然跌落（以當時技術水平，此過程約耗時兩年）。<sup>(160)</sup> 前述因市價變動而蒙受的損失，更因臺灣木材生產費的高昂與大正十一年（1922）後的經濟不景氣而雪上加霜。<sup>(161)</sup> 由圖四視之，大正十至十三年（1921-1924）的民營材產量的確 521,583 石下降至 135,130 石。<sup>(162)</sup> 值得進一步推敲的是，若資本家怯於投資導致木材供給減少，木價為何回升程度有限？基本上，這就牽涉到日臺間的木材貿易狀況。由表十可見，大正年間臺灣對日木材貿易一直呈現大幅移出超，且移出部份幾為檜木，移入則多為松杉。在日治臺灣的林野研究史中，此即矢內原點出而周憲文引之為殖民剝削的日臺木材貿易規則：日本向臺灣買檜木而賣松杉。<sup>(163)</sup>

不過，「買檜木而賣松杉」毋寧是表面的現象，更根本的原因實與內地的「米騷動」如出一轍，係因一次戰後內地資本主義發展過速而引起。一九一〇年代的日本農村釋出大批農民湧入都市，都市人口激增引發住宅不足、房租升高與生活

(158)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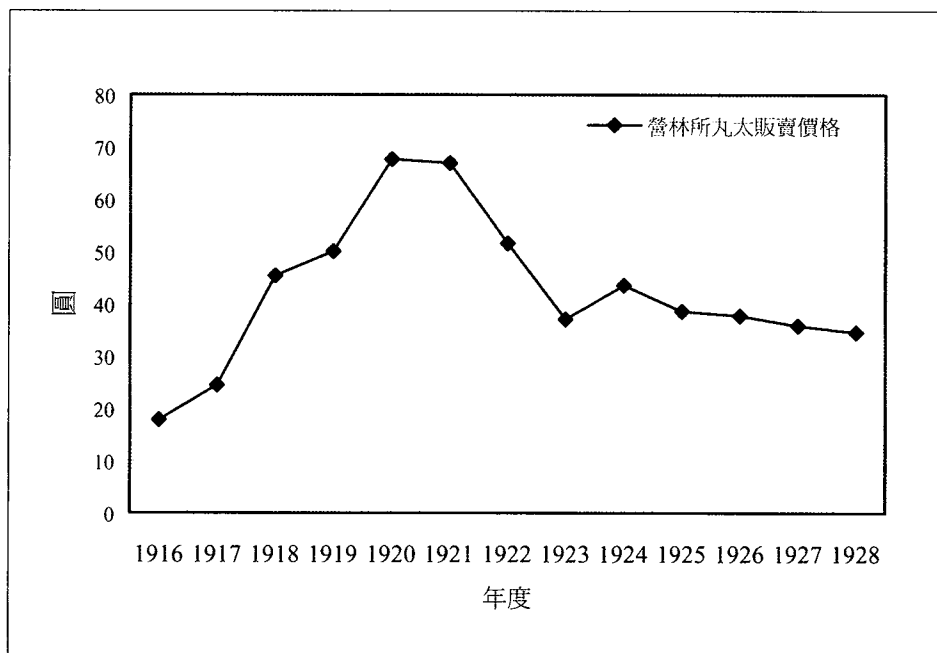
(159) 同上註，頁 46。

(160) 戰後初期的國有林經營在同樣制度設計（相同的林產處分公式與特賣之法）但截然不同的政經脈絡下（因國府遷臺導致臺灣木材奇缺，木價節節高漲），產生全然相反的後果。參考洪廣冀，〈戰後初期之臺灣國有林經營問題〉，頁 87-94。

(161) 根據青木繁提供的羅東郡大元山林產處分資料，在九種樹種裡，每石木材之生產費均佔市價的七至八成；參考青木繁，《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頁 535-536。

(162) 大正十三年（1924）的回升係關東大地震之復舊亟需用材所致，不過似乎是曇花一現。

(163)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 144-145；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北：開明，1980），頁 751。



圖六 大正五年至昭和三年(1916-1928)用材市價估計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46。

品質急速下降等問題。一旦都市化程度加劇，日人又偏好木式建築，加上若干新興工業亟需木料，內地用材生產不但不足所需，且可能將漸上軌道的林業拖垮。<sup>(164)</sup>大正九年（1920），帝國議會決議解除部分品等木材的對美關稅，擬適度引入美材以緩解內地的木材供需問題。不料，此時的美國正處在一次戰後的不景氣中，美材的價格滑落且日美間的船運費亦甚低廉；一九二〇年代間，以松（pine; バイーン）、杉（fir; ファー）、柏（cedar; シダー）為首的美材開始以「破竹之勢」湧入內地木材市場，大正九年（1920）美材輸入量從戰前的二、三萬石激增為 872,800 石；翌年的輸入量更增加為 8,273,112 石。大正十三年（1924）的木材輸入量已躍升至輸入品的第三位，僅次於棉花與鐵。美產松杉可與內地材相互替代，且美材的生產費亦較內地材低廉；美材大量輸入內地市場而壓低整體材價，讓內地的伐

(164) 大日本山林會，〈木材輸出杜絕〉，《大日本山林會報》456（大正9年11月），頁54-55；萩野敏雄，〈日本近代林政の發達過程〉，頁177-256；渡邊全，〈外材輸入の局勢と其對策〉（東京：財團法人帝國山林會，1925），頁2。

木與製材業者頗感吃力，事業面臨入不敷出的危機。<sup>(165)</sup>就內地林業界而言，「日本向臺灣買檜木而賣松杉」毋寧是難以接受的現象；臺灣這個最老牌的日本殖民地、號稱「森林王國」的地方，為何不能提供松杉以解決日本帝國的用材不足問題？<sup>(166)</sup>

前述目標的達成談何容易，尤其是松杉材多位於一般國有林野內，須由資本家配合才行。然而，此時臺灣一方面成為內地林業舒張壓力的空間，<sup>(167)</sup>另一方面，由表十亦可看出，自大正十年（1921）起，超過十萬圓的美材透過內地而移入臺灣。<sup>(168)</sup>在輸入材的夾擠下，資本家投資林業的意願難有起色。<sup>(169)</sup>然要強調的是，投資意願的低落本來不至於發生，因為資本家伐採國有林的代價原本只是繳交與市場無甚關聯、以政府公告為準的標準單價。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林產處分改革之後，資本家的作業成本才與市場緊密相繫。為了校正資本家濫伐國有林的林產處分改革巧妙但意外地與大正九年（1920）起的日臺、日美木材貿易匯成一股暗流，衝擊的並不完全是國有林的經營利潤問題，更與當時「集約」的經營理念大大抵觸。如前所述，民營伐木於大正十至十三年（1921-1924）有著產量遞減的現象（圖四），但圖三所列的處分總價卻逐年提高。理論上言之，在市價下滑、生產費居高的脈絡下，處分總價的提升應是處分材積大幅增加所致。在這個意義上，一向關心臺灣林產處分制度的安詮院貞熊，提供了一個可能答案。安詮院觀察到，伐木業者將兩三百年生的樺木於地上三尺伐倒，以八尺胴切（林業術語：切段之意），所餘枝梢材兩尺逕於林中放棄。原來，取得該森林之伐採權的資本家只為製造八尺之電桿桿材，其餘部分一者難求於市，二者製材困難，不如加以放

(165) 木材關稅問題至為複雜，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就此多所著墨，相關文獻與論著參考大日本山林會，〈米松輸入激增〉，《大日本山林會報》446（大正9年1月），頁37；安詮院吉弘，〈木材關稅問題の経緯〉，《臺灣山林會報》37（昭和4年5月），頁13-50；渡邊全，〈外國材の輸入に就て〉，《大日本山林會報》477（大正11年8月），頁33；渡邊全，〈外材輸入の局勢と其對策〉，第一章。

(166) 當時日本殖民朝鮮不久，還未能出材；樺太則因森林病蟲害侵襲，自顧不暇。參考渡邊全，〈外材輸入の局勢と其對策〉，頁1-3。

(167) 因臺灣的木材生產費較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杉本良以其自身經驗估計，將木材從臺灣山區運至平地的費用每石約二十圓上下；以海運將木材從日本運來臺灣僅需一圓左右。參考杉本良，〈臺灣林業所感〉，頁13。平賀正二亦指出，臺灣雜木與內地的松杉相較，雜木市價遙遙領先，允為奇特現象。參考平賀正二，〈林產物拂下方法の改善と木材の金融化〉，頁51。

(168) 佐治孝德，〈臺灣の營林事業に就て〉，《臺灣の山林》79（昭和7年11月），頁54-58。

(169) 杉本良，〈臺灣林業所感〉，頁11；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査書〉，頁104、133-134。

表十 大正年間臺灣內地之木材貿易關係

單位：圓

	從臺灣移出至內地		從內地移入至臺灣					移入—移出 (B-A)
	總額(A)	檜材板合計	總額(B)	杉材板	松材板	美材	檜材板	
1912	66,579	53,171	3,470,873	2,408,609	374,762	n.a.	8,410	3,404,294
1913	102,222	64,746	3,002,171	2,071,649	314,686	n.a.	8,224	2,899,949
1914	188,239	177,630	2,096,555	1,431,923	155,249	n.a.	8,418	1,908,316
1915	202,513	190,709	1,754,210	1,034,412	161,069	n.a.	n.a.	1,551,697
1916	627,722	590,659	1,667,750	836,226	193,288	n.a.	n.a.	1,040,028
1917	814,389	701,458	2,509,903	1,401,465	317,319	n.a.	4,714	1,695,514
1918	651,515	533,415	3,100,437	2,026,145	182,013	n.a.	1,375	2,448,922
1919	570,862	471,247	4,972,486	3,453,425	364,198	2,540	18,715	4,401,624
1920	1,467,663	1,348,395	7,731,979	4,437,740	709,487	84,755	37,887	6,264,316
1921	5,857,17	497,497	4,400,138	2,235,938	460,347	198,831	n.a.	3,814,421
1922	1,752,950	1,444,671	2,895,174	782,278	317,985	238,430	n.a.	1,142,224
1923	3,326,867	2,569,249	1,841,614	495,189	326,867	201,387	n.a.	-1,485,253
1924	2,058,828	1,345,120	1,370,815	265,822	255,213	144,838	n.a.	697,983
1925	2,800,767	2,225,982	3,526,753	1,325,285	208,581	152,356	n.a.	725,986
總計	15,216,833	12,213,949	44,340,858	24,206,106	4,341,064	1,023,137	87,743	29,124,025

說明：1.若不同《林業統計》所載之同年份資料彼此不符，以近者為準。

2.大正十三年（1924）所列資料之移入減移出之額應為-688,013。

3.n.a.表 not available；《林業統計》中以橫線表示。根據該書所付的使用說明，橫線表該數據「不可得」。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臺灣林業統計》（大正十四年度），頁87、94、98、100；《臺灣林業統計》（大正十三年度），頁107-111、119、126-127、132；《臺灣林業統計》（大正十二年度），頁113、118-121、130；《臺灣林業統計》（大正十年度），頁165、170-175。

棄，以免不敷出。安詮院的觀察顯示國有林售賣收益增加的另面隱憂，也就是在材價不況、生產費高昂的限制下，即便資本家願意投資林業，其施業也將造成國有林的浪費；安詮院痛陳道：「天賜遺利浪費至此……，喜多局長的『集約利用』言猶在耳，實為一大警鐘！」<sup>(170)</sup>

不僅民營伐木面臨資本投資意願低落與貨棄於地的困境，官營林場亦有本難念的經。表十雖然顯示臺灣對內地的檜木貿易成績頗佳，但當時臺灣正逢嚴重水患，阿里山等官營林場受損慘重，木材搬出成本極高。官營材因其材質不符臺灣市場需要，價格呈現低落，若有搬出多移至內地求售。<sup>(171)</sup>然領臺以來專為內地代

(170) 安詮院貞熊，〈新聞紙を通じて觀たる母國林政の新傾向〉，《臺灣山林會報》8（大正13年7月），頁10-11。

(171) 佐治孝德，〈臺灣の營林事業に就て〉，頁57-58。

理官營材的神戶鈴木商店與東京野澤組，與營林所契約期滿後不再續約，且內地政府正準備以朝鮮與樺太取代臺灣在溫帶林業的角色。<sup>(172)</sup> 林業官員淺野安吉便語重心長地指出：「營林所的困境正要開始」。<sup>(173)</sup> 在臺灣山林會十週年紀念大會中，來自內地的林學者八古正義直指「森林佔臺灣面積七成以上，單位面積的森林蓄積也較內地為高」；然總蓄積量雖高，卻多為林相「低劣」之闊葉樹；闊葉樹的豐富雖有助於薪炭材自給，對產業發展亟需的用材卻於事無補。<sup>(174)</sup> 八古正義強調：臺灣每單位面積的森林伐採量為內地的六分之一，總價值為五分之一，導致年需百萬石以上的木材移輸入，林產額僅佔總產業收入的百分之二，「林業實為臺灣之恥辱」。<sup>(175)</sup>

國有林野裡的林產處分與官營林場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面臨經營失焦的危機，但民有林野的經營亦有難處。如前所述，林業做為一類產業，特徵即在生產時間長，須一定規模方有利潤可圖。在此限制下，各筆面積不足一甲（0.96 甲）的民有林野，先天上已不利於經營。<sup>(176)</sup> 雖說殖民政府設有造林低利貸款、補貼與獎勵金等制度，並補助各州廳於其轄內各郡庄、大字成立造林或森林組合，<sup>(177)</sup> 但貸款金額係以林主持有之林地面積或林木價值為擔保發放，受惠者多為拓殖時期以造林名義提出申請的資本家。對於持有面積零細、營林樹種多以生產副產物的民有林主而言，前述制度有著門檻存在。<sup>(178)</sup> 地緣人民獲取補助的途徑，僅能以成立造林或森林組合的名義，向各地方主管機關或警察官派出所提出申請。<sup>(179)</sup> 對照

(172)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臺灣林業最近十年の鳥瞰〉，《臺灣の山林》78（昭和7年10月），頁87-88；淺野安吉，〈臺灣林業の回顧〉，《臺灣の山林》78，頁17。臺灣檜木雖與內地之木曾材並列為貴重木材，惟其色澤較深，就木材加工業而言並不討喜。所幸臺檜防蟲蛀的特性，又有別於美材等長大材，渡海去日的檜木多成為鳥居的樑柱與武士刀刀柄。參考宮瀨浩，〈營林所材とその市場〉，《臺灣の山林》85（昭和8年5月），頁132-133。

(173) 淺野安吉，〈臺灣林業の回顧〉，頁17。

(174) 八古正義，〈臺灣の森林とその開發〉，《臺灣の山林》79（昭和7年11月），頁30-31。

(175) 同上註，頁28-31。另外，據《臺灣農事報》於昭和元年（1926）發佈的統計資料，臺灣林野面積2574千町，佔總面積之71%；惟林業產值43,398,516圓，佔農、工、商業等總產值的6%。參考《臺灣農事報》242（昭和1年2月），頁2-3、5。

(176) 〇點九六甲是深谷留三與野仲忠彥提供的數字，部份驗證前文就民有林野的論說；參考深谷留三、野仲忠彥，〈臺灣に於ける私有林業の振興と森林組合〉，《臺灣山林會報》34（昭和3年11月），頁3。

(177) 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査書》，第三章。

(178) 同上註，頁287-293。

(179) 東村龍成，〈山村民の安全と福祉を祈願して〉，《臺灣の山林》104（昭和9年12月），頁4。

內地民林的情形，森林組合仰賴的母法是明治三十年（1897）的「森林法」，以允許甚至強制的手段讓各零細業者「入會」，其管理的林野即被歸入公有林野。但「臺灣森林令」並無相關規定；〈臺灣森林令設置ノ理由書〉曾解釋道：此係顧及臺灣人民欠缺協同精神、自我本位、林業思想未及發展，明定森林組合法規的時機尚早。<sup>(180)</sup> 母法欠缺導致殖民政府在推動森林組合時頗有窒礙難行之感；昭和二年（1927）臺灣僅有九個森林組合，且據林業官員如深谷留三與野仲忠彥的觀察，運作均不甚理想。<sup>(181)</sup>

營林的環境困難，殖民政府農業部門卻積極推動蔗作獎勵；<sup>(182)</sup> 影響所及，地緣人民的營林方式一則是縮短森林輪伐期，期間趁勢改種甘蔗或芭蕉，或則採用混農林業之法，於林下間種作物。<sup>(183)</sup> 地緣人民的無斷開墾與當時國有林野內八萬六千名蕃人的山田燒墾，並列當時林業之「癌腫」。以「癌」做為比喻，不知是否有意，但在當時林業官員的描述中，迸發的野火與不時出現的盜墾地，確實如「癌」一般地向國有林野中擴散。<sup>(184)</sup> 儘管「森林令」設置了森林警察與森林主事專司取締，但一方面各人負責的巡防面積極大，有效取締「殆不可能」；<sup>(185)</sup> 另一方面，何處才算國有林野的範圍，亦欠缺明確的地圖可供查考。因為，當時國有林野的境界測量僅有在阿里山等指定國有林野中推行，其餘的一般國有林野仍是指民有林野以外的土地。<sup>(186)</sup> 惟位於民有與國有林野交界的境界標石，已因人民開墾、放火與畜牧而多有毀損。<sup>(187)</sup>

總結而言，當殖民政府嘗試透過林產處分的改革以整合資本家從事集約經營，卻在殖民母國與國際局勢的夾縫中，讓臺灣林野中的遺利甚有貨棄於地的危

(180) 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頁37。

(181) 深谷留三、野仲忠彥，〈臺灣に於ける私有林業の振興と森林組合〉，頁4-6、10。

(182) 安詮院貞熊，〈新聞紙を通じて觀たる母國林政の新傾向〉，頁9。

(183) 當時林業界的解釋是臺灣的小作慣習所致；同上註，頁9-10；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頁19-20。臺中州的營林實況可參考千葉豐治，〈山が荒るれば平地も荒れる治めませうや荒れ山を〉，《臺灣山林會報》57（昭和5年12月），頁1-10。

(184) 千葉豐治，〈山が荒るれば平地も荒れる治めませうや荒れ山を〉，頁5-7；亦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頁36。

(185) 臺北、新竹與臺中州每名主事的管轄面積約在兩萬餘甲，臺南與高雄州約一萬七千餘甲，臺東廳高達八萬五千餘甲，花蓮港廳更廣達十一萬餘甲之多。參考賀田直治，《臺灣林業史》第二卷，頁53-55。

(186)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頁21。

(187)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林野事務主任會議議事錄》，頁1。



機，總督府悉心安置在國有林野邊緣的民有林野，表現亦不讓政府滿意，臺灣的林野事業或許不是如何「發展」，而是怎麼「存活」等問題。在此脈絡下，上自殖產局長下至《臺灣山林會報》上的言論，逐漸凝結的共識是：終止一般國有林野的作業計畫調查，速編全島林野之施業案。<sup>(188)</sup>殖產局長喜多孝治便指出：為劃定林業永遠保續經營之地域、基於科學觀點決定植伐順序、確定施業方針以及估計一定期間內的森林收穫等目的，自大正十三年（1924）起著手一般國有林野施業案的編製。<sup>(189)</sup>大正十三年（1924），正值臺灣「財界惡化深刻」之際，「臺灣林業界之多年要望」——森林計畫事業，以總預算三百萬圓於翌年付諸實施。<sup>(190)</sup>「森林計畫事業規程」明言該事業是立基在國土保安之公益達成、森林利用更新之經濟開發等考量；首先依治水調查決定森林施業原則，其次決定適合林野與經濟現狀的土地使用區分，最後對營林之要存置林野的經營加以立案。<sup>(191)</sup>大正十四至昭和十年（1925-1935）的十一年間，全臺 877,629.46 公頃（預定面積為 846,000 甲）的要存置林野在分為三十二個調查區分別執行施業案調查後，確立為二十九個事業區（參考圖八）；<sup>(192)</sup>各事業區並由殖產局林務課在國土保全、林產保續與統制、地緣民生計等考量下編製施業預定案。<sup>(193)</sup>預定案在編製完竣後交付殖產局長主持的審議會審議，參酌地方廳意見後以「施業案」的名義公告實行。<sup>(194)</sup>昭和五年（1930）起，因林野事業的困境日益嚴重，即便預定案未經審議仍得以「基本案」之名推動。<sup>(195)</sup>昭和四年（1929），南庄與南投事業區率先實施施業案；昭和七至十年（1932-1935），共計東勢、宜蘭、羅東、北港溪、恆春、文山、竹東等事業區依次實施；昭和十一年（1936）起，所餘二十個事業區一併實施。<sup>(196)</sup>在二十九事業區中，僅南庄、南投、東勢、北港溪以施業案實施，其餘皆採基本案之

(188) 伊藤太右衛門，〈臺灣明日の林政〉，頁 11-12。

(189)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林務會議に於ける殖產局長訓示〉，頁 2。

(190) 淺野安吉，〈臺灣林業の回顧〉，頁 17。

(191)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7），頁 29-30。

(192) 同上註，頁 16、59-60；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 66-68。

(193)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冊）〉，頁 59-60；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 477-478、624-635。

(194)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冊）〉，頁 44-46。

(195)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 677。

(196) 同上註，頁 677。

法。(197)

不過，由圖八視之，施業案的施行地域多處在林野整理時查定的要存置林野，尚未完全包含森林計畫事業區分的要存置林野（參照圖七）；在這個意義上，殖民政府以施業案緩解林野經營問題的意圖更為明顯。惟須強調的是，前述地域的施業邏輯已與第二節論及的遺利甚多大有不同，月岡貞太郎用來估計蘭地之林產豐富程度的算式已被棄卻，取而代之的是以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的觀念界定經營者與森林間的關係。意即，經營者不再追問森林蓄積量至何時才會倍增已決定伐採量，而是將森林的生長量視之為利率、伐採為提款、造林為存款，在十年的施業期中考量特定樹種的伐採造林比例。從近代林業的系譜來看，這樣的邏輯與十九世紀林業於德、法學科化後的理想型甚為接近。<sup>(198)</sup> 安詮院貞熊即以歡欣且自惕的文字寫道：林業家無條件地受託「料理俎上鮮魚兩百萬町步」，自然不能「任其所好」，而是要「公平適切地滿足四百萬島民之嗜好、本島經濟之根本設施以及治山治水等大業」。安詮院並指出：「吾等森林家均須以一貫之至誠，投入熱烈如火之意氣與愛國至情，負起此般林野事業的重責大任。」<sup>(199)</sup> 就這些活躍在林業部門、臺灣山林會等機構的林業家而言，森林計畫事業的實施意味著其服膺的知識體系將躍升為政策主流。<sup>(200)</sup> 只是，在遺利甚多的認識基礎幻滅之後，前述體系真能解決三〇年代林野事業的現實問題以及四〇年代軍需工業的發展需要？從後見之明來看，林業在四〇年代的表現的確相當突出。例如張宗漢指出：「比較各業發展情形，則林業發展最速。」<sup>(201)</sup> 涂照彥亦強調製材與木製品工業的「明顯膨脹趨勢」。<sup>(202)</sup> 但林業的發展或軍需工業化是如何可能？其中又涉及國家、資本

(197) 這就是為什麼在臺灣大學圖書館、臺灣分館等處收藏的森林計畫事業資料會有基本案與預定案的差別；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冊）》，頁4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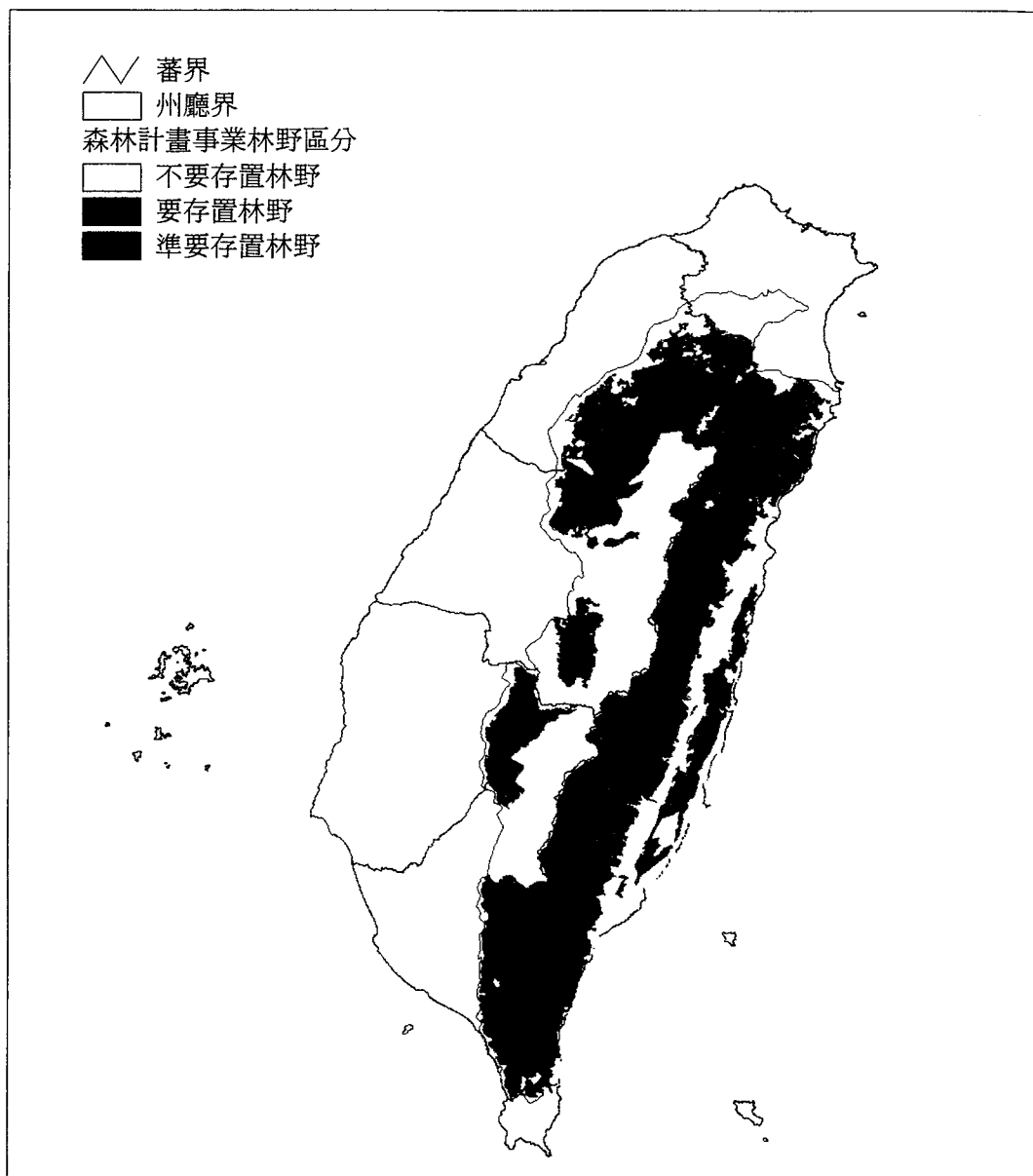
(198) Henry Lowood 即明言以資產負債表決定森林與經營者的關係是近代林業的特徵；依據該概念打造的理想型，林業術語稱為法正林（normal forest）；參考 Henry Lowood, "the Calculating Forester," pp. 333-340. 森林計畫事業的主事者並不諱言臺灣林業應向此理想型看齊，從而將繁雜的天然林轉為林相單純、循序有致的法正狀態。參考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頁593、597。

(199) 安詮院貞熊，〈森林計畫事業の著想は須く遠大なれ〉，《臺灣山林會報》33（昭和3年9月），頁3、7。

(200) 淺野安吉，〈臺灣林業の回顧〉，頁17。

(201) 張宗漢，〈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2001），頁17。

(202) 涂照彥著，李明俊譯，《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頁147與註47。



圖七 森林計畫事業林野區分示意圖

說明：原圖比例尺為三十萬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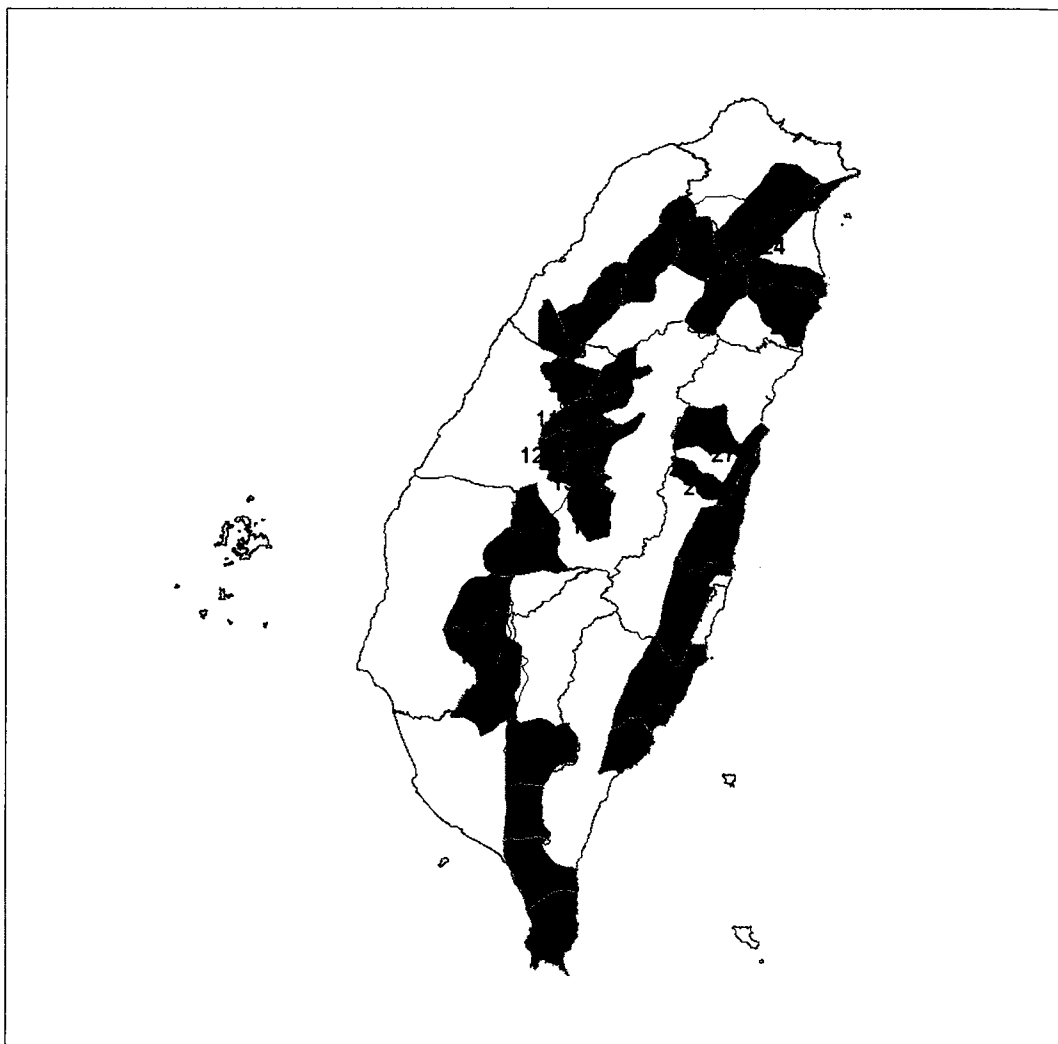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之附圖「森林計畫事業林野區分與三角點配置圖」轉繪。該圖目前收藏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原圖計四張，惟右上角已經遺失；復參考吳樹權，〈臺灣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變遷之研究：日治時期迄今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演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之附圖轉繪。吳文的附圖係取材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目前該圖業已亡佚。

與地緣人民間的何種關係？這些問題的答案仍待進一步深究。但無論如何，如果說森林計畫事業的確改善了林業在當時產業的落後地位，其作用也很難是在一種高瞻遠矚、彷彿不致於鑄成過錯的目光下導引前進，即便臺灣林業於四〇年代有著跳躍性的發展，我們也很難接受森林計畫事業即意味著「資本征服臺灣全土」；誠如圖八所示，至少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林野圖中，臺灣的中央尚有巨幅空白，資本主義的基礎工事、殖民政府對臺灣林野的瞭解以及政府、地緣人民與資本家之間的競合關係，仍等著在這片最後的「帝國山林」中展開。

## 七、臺灣林野研究史的再思考

森林做為臺灣土地的主要類別，自不可能排除在日治時期臺灣的資本主義化歷程外；然林野的資本主義化係如何開展，在臺灣史的書寫裡尚呈隱晦不明的狀態。就矢內原忠雄而言，林野事業的意圖是掛在「資本主義基礎工事」的計畫底下；剝奪／反抗論者則提醒我們，這套計畫是以「臺灣人」的苦難為代價。這些論點分別從不同角度分析同一個階段且演化性的過程，卻從未深入探討這個過程本身。此境況直至歷史學者李文良一系列的論著出現，一個不知所措卻又知所變通的殖民者圖像方逐漸明晰。李氏的合理／合法化論提醒我們，殖民政府來到一個風土民情均與內地相異的殖民地，首先著手的不是一個個精心打造與構思的剝削計畫，而是平心靜氣地順應臺灣既存的林野利用慣習，從而確立不同利益關係者的政治效忠。甚至，他還小心翼翼地暗示：為了統治穩定的考量，殖民政府甚至可擱置原先的某種構想。然關鍵是，到底什麼是殖民政府的林野治理與近代化構想？前述提問必然回映至順應是給予利益關係者怎樣的權利內涵；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未能解決而只能訴諸矢內原的資本主義化時，合理／合法化論在一定程度上與剝奪／反抗論沒有什麼不同；一方面延續了矢內原在論及殖民手段時的兩面性，另一方面，合理／合法化論只是在與剝奪／反抗論不同的起點上，勾勒出另條、但仍是直通「資本征服臺灣全土」的道路。

本文從日治初期殖民政府之於臺灣林野的分類架構出發，指出林地與林木一直是政府在界定利益關係者之權利內涵時的兩條軸線。然而，在面對臺灣社會既有的林野舊慣時，新規與舊慣間實有難能接合之處，尤其對於人民採取林產的行



圖八 森林計畫事業區區分示意圖

說明：各數字代表之事業區如下：

1 文山	2 太平山	3 大溪	4 竹東	5 南庄	6 大湖	7 三叉	8 東勢
9 八仙山	10 北港溪	11 埔里	12 南投	13 集集	14 巒大	15 竹山	16 阿里山
17 大埔	18 玉井	19 旗山	20 屏東	21 潮州	22 枋山	23 恆春	24 宜蘭
25 羅東	26 南澳	27 木瓜山	28 林田山	29 太巴塢	30 玉里	31 里壠	32 臺東

2. 本圖資料出自昭和六年(1931)出版的《臺灣森林ノ基本調查書》，為殖產局於昭和五年(1930)向臨時臺灣產業調查會提出的書面報告。該會在召開時森林計畫事業仍在進行中，基本調查書所列的區劃因而不乏更動。上表列出的大湖與三叉事業區合併為大湖事業區，屏東、潮州、枋山、恆春合併為恆春事業區，南澳與木瓜山之間地域增設新港事業區；即為森林計畫事業完畢後確立的二十九個事業區。

資料來源：據臺灣總督府殖產局，《臺灣森林ノ基本調查書》附圖「森林計畫豫定地域圖」轉繪。

爲，更要至林野調查時方以保管林的設計初步解決。與之對照，在政府理蕃與荒地開發等考量下進駐官有林野的資本家，其運作雖是以林地爲主的拓殖經營；但透過林產價值方得成立的「遺利」，毋寧是促成資本與政府結盟的重要誘因。然在理蕃事業完成與一次大戰結束後，林野事業脫離了從屬於樟腦業與拓殖經營的範疇；官有林野整理將原先以保管林限制的緣故關係者整理出來成立民有林野的類屬，透過授產、知識灌輸與法令強制，殖民政府嘗試將之改造爲鑲嵌於國有林中、可自行維生又無礙山林保育的「林業家」，同時裨益因大戰而勃興的林產事業。然而，被安置於不要存置林野內、未及整理的資本家，趁著局勢改變與既往拓殖制度之便，其作業竟造成當時保育意識下的濫伐。對此，殖民政府一方面集中國有林野的經營權，另方面整合資本之力從事林野事業的集約；不料前述改革卻在殖民母國與國際局勢的夾縫中，讓林野的遺利甚有貨棄於地的危機。在此脈絡下，一套源自歐陸的知識體系——近代林業——終被援用，透過施業案的編製，政府嘗試以森林計畫事業重整三〇年代的林野事業的藍圖與邏輯。簡言之，林業於三〇年代的近代化——或說歐陸化——是與殖民統治、資本主義密不可分的；並且，三者間的關係不是簡單地相互增強，也不是單純地直線演化；即便殖民政府在其中若干環節——如林野的產權界定、知識生產以及利益關係者的確認——等面向上扮演重要角色；林野事業的過程仍有必要放在政策與執行的落差、殖民地與母國的張力以及不同利益關係者的互動中思考。

除了從林野觀、因徑互賴以及整體尺度等面向探討日治初中期林野事業的開展外，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殖民政府嘗試施加在林野之上的藍圖是否與田園一致？意即，林野的資本主義化是否有其邏輯而不能與田園相互化約？基本上，前述提問要從更深遠的歷史脈絡觀之才更爲清楚。當馬克斯說的原始積累發生在英國田園之際，森林先移入貴族隨後落入國家之手；<sup>(203)</sup> 爲緩解十八世紀林產不足或森林破壞導致的社會不安，林業從原先的「貴族獵場管理之術」轉爲統治科學

(203) 關於這段歷史，馬克斯與湯普森（E. Thompson）針對普魯士之「林賊法」與英國惠格黨的討論，恰可與原始積累、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等一脈相承的「田園資本主義轉型」相對照。參考 Karl Marx,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Rhine Province Assembly. Third Article. Debates on the Law of the Theft of Wood," in R. Dixon trans. and ed.,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pp. 224-263; Edward Thompson,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 (London: Allen Lane, 1975).

(police science; cameralism; *kameralwissenschaft*) 的一支，主張從財產權而非市場的層次介入森林相關之社經活動的全部。<sup>(204)</sup> 然而，誠如《傅科效應》(*The Foucault Effect*) 的若干論文指陳的，統治科學在亞當·斯密代表的政治經濟學興起後，無法以如此全面且直接的形式介入社會而告衰落；<sup>(205)</sup> 與之同時，統治的邏輯卻在國有林經營中留存下來，林業進一步化身為「治理科學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與國家福祉的管理員。<sup>(206)</sup> 當我們考慮到林野的資本主義化在起點與形式上即與供為農用或商品作物栽植的土地不同時，自須進一步追問殖民統治下的林業發展有何特色？基本上，這樣的提問正是南亞環境史的關切所在，相較於北美環境史家傾向以生態學的觀點解釋美洲大陸為英國殖民後的變遷，論者如 David Arnold Ramachandra Guha、Richard Grove 更關切林業的科學性格是如何被殖民者用在殖民地環境與人民的控制上；若以 Daniel Headrick 的話來說，近代林業相當於一類「帝國工具 (imperial tools)」。<sup>(207)</sup> 就南亞環境史的研

- 
- (204) “Cameralism” 在中文中似乎未有普遍的譯法，“police science” 是 Colin Gordon 的英譯與解釋方式。參考 Colin Gordon, “Governmentality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11. 然前述著作在使用 “police” 一詞時，該詞的意義與中文的「警察」有著一定差距。就林業而言，日本林業學者（或受日本林業訓練的林學者）常有意識地將近代林業的起源回溯至 cameralism 或德文的 “*kameralwissenschaft*”；參考小澤今朝方著、白迺義譯，〈森林計畫與國有林經營計畫的展望〉，《臺灣森林》3: 8 (1957 年 8 月)，頁 22-28。若以林業的日文譯法，cameralism 稱為官房學；參考日本林業技術學會，《和英／英和林業語彙》（東京：日本林業技術學會，1969），頁 162。
- (205)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發生在德國的治理科學與政治經濟學的消長，是 Michel Foucault 解釋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為何十八世紀興起的重要原因；Colin Gordon 的導論有著相當清楚的說明。參考 Michel 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96-99; Colin Gordon, “Governmentality Rationality,” pp. 14-27. 就本文關切的資本主義而言，參考同書收錄的 Pasquale Pasquino 論文；Pasquale Pasquino, “Theatrum Politicum: The Genealogy of Capital-Police and the State of Prosperity,”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pp. 105-118.
- (206) 關於 cameralism 與治理科學的討論，參考 Keith Tribe, “Camer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 (1980), pp. 172-196; 林業與治理科學的討論，參考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22. 關於林業、原始積累與國家福祉的討論，參考 Peter Linebaugh, “Karl Marx, the Theft of the Wood, and 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6 (1976), pp. 5-16.
- (207) Daniel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究者而言，林業與資本主義相異（但不一定相斥）的邏輯是相當明顯的；與其探討林業是如何導致森林與原本的擁有者分離而向資本手中集中，倒不如扣連至國家打造（stakemaking）、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或者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等議題。<sup>(208)</sup> 正如著名的印度森林史家 Ramachandra Guha 所言的：「近代林業（而非資本主義）以自身形象打造全世界」，明白地點出其取向與馬克斯主義間的連屬與斷裂。<sup>(209)</sup>

然相對而言，前述論法卻有著兩面向的隱憂；首先，Satpal Sangwan 在其主編的《自然與東方（*Nature and the Orient*）》一書中批評「帝國工具說對此套工具如何為殖民者所用」理解還是太少，<sup>(210)</sup> 另一方面，David Arnold 指出論者常誇大科學的自主性、以今日的環境價值逆推殖民時期從而忽略幾近壓倒性的帝國意索（imperial ethos）。<sup>(211)</sup> 由此反觀臺灣史的林野研究，在「臺灣資本主義化」的典範下累積的豐富討論，似可彌補南亞環境史「重政治而輕經濟」的缺陷；然而，這就迫使我們面對如下的問題：就遲至十九世紀末才進場、在當時帝國競逐中呈後進之勢而在知識學習與繼受上有著優勢的日本帝國，在面對與內地環境截然相異的臺灣時，採取的策略、知識體系又會產生何種改變？<sup>(212)</sup> 至少，從本文的

(208) 關鍵原因是，在多數的殖民情境中，森林成為資本家名下之私有財產的情形相當少見；大部分是如臺灣一般，森林在財產權歸屬上屬於國有，國家再以林產處分或林野貸渡之法整合資本家。南亞環境史的重要著作參考 Richard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Ramachandra Guha, *Unquiet Woods: the Ecological Bases of Ecological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Nancy Peluso,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K. Sivaramakrishnan, *Modern Forests: State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olonial Eastern Ind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eter Vandergeest and Nancy Peluso, "Territori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 in Thailand," *Theory and Society* 24(1995), pp. 385-426.

(209) Ramachandra Guha, *Unquiet Woods*, p. 59.

(210) Satpal Sangwan, "From Gentlemen Amateurs to Professionals: Reassessing the Natural Science Tradition in Colonial India 1780-1840," in R. Grove, V. Damodaran and S. Sangwan,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0-212.

(211)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p. 168.

(212) 一八七〇年代明治政府開始有計畫地派遣留學生前往德國學習林業；明治八年（1875）松野礪自德國 Eberswalde 高等森林學校畢業，返國後於明治十五年（1882）創設東京山林學校；明治二十三年（1890）在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內發展林學科。除了松野礪，如中村彌六、志賀泰山等德國留學生，



分析來看，若我們不能對林業與資本主義難能相互化約的邏輯有所區辨，可能會創造或詮釋出資料並不隱含的「異例」或「特殊性」；唯有在分析林野為誰所有、殖民者對殖民地資源的渴求以及殖民地對母國的從屬關係時，兼顧那套用來治理或調控環境的知識體系及其在相關知識系譜中的位置，一方面嘗試將臺灣環境殖民化<sup>(213)</sup>的過程定位在更廣的區域脈絡中；另一方面，當殖民政府透過一連串林野事業而以全島為尺度打造其藍圖時，臺灣內部的區域研究勢必面對保管林、民有林野等類別在地方層次如何定位等問題。由此看來，將林野或說廣義的「環境」納入歷史分析，不僅是為林業史、社會經濟史或者理蕃研究等提供背景或舞臺而已，一方面能如 Donald Worster 所說的「將歷史的視角向下刨得更深」，<sup>(214)</sup> 同時也能為學科間、區域間以及不同研究傳統間的對話提供新的可能性。

定稿日期：2004.9.3

---

返國後不但進入學院任教，亦躋身官場著手林業制度的規劃；參考井上由扶，《森林經理學》（東京：地球社，1974），頁 14-15。日治時期來臺任職的林業家不少是前述學者的學生，甚至不乏著名的歸國學人。參考李文良，〈帝國的山林〉，頁 49-50。

(213) 環境殖民化的界說參考 David Arnold,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pp. 169-187.

(214) Donald Worster, "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89.

附錄一 昭和二十至三十三年(1927-1938)國有、公有與私有山林原野的面積

	國有地			公有地			私有地			總計			比例		
	山林	原野	合計	山林	原野	合計	山林	原野	合計	山林	原野	合計	國有 山林原野	公有 山林原野	私有 山林原野
1927	1,952,849	386,357	2,359,406	2,574	2,617	5,191	203,383	45,967	249,350	2,158,806	455,141	2,613,947	90.26	0.20	9.54
1928	1,778,266	569,809	2,348,075	3,682	1,397	5,079	184,562	71,486	256,048	1,966,510	642,672	2,609,182	89.99	0.19	9.81
1929	1,782,671	550,693	2,333,364	4,377	3,873	8,250	166,727	79,955	246,682	1,953,775	634,521	2,588,296	90.15	0.32	9.53
1930	1,668,066	627,107	2,295,173	5,701	1,428	7,129	176,457	75,576	252,033	1,850,224	704,111	2,554,335	89.85	0.28	9.87
1931	1,736,299	544,685	2,280,984	8,337	1,604	9,941	196,329	54,277	250,606	1,940,965	600,566	2,541,531	89.75	0.39	9.86
1932	1,743,591	525,076	2,268,667	13,509	3,789	17,298	200,171	52,584	252,758	1,957,274	581,449	2,538,723	89.36	0.68	9.96
1934	1,732,234	518,373	2,250,607	11,271	2,196	13,467	207,021	48,996	256,017	1,950,526	569,565	2,520,091	89.31	0.53	10.16
1935	1,707,276	512,980	2,220,256	11,625	3,085	14,710	220,356	47,908	268,264	1,939,257	563,973	2,503,230	88.70	0.59	10.72
1936	1,711,648	503,666	2,215,314	12,112	3,529	15,641	220,663	45,131	265,794	1,944,423	552,326	2,496,749	88.73	0.63	10.65
1937	1,689,265	490,265	2,179,530	11,127	2,602	13,729	216,512	43,977	260,489	1,916,904	536,844	2,453,748	88.82	0.56	10.62
1938	1,655,301	499,895	2,155,196	12,583	1,977	14,560	216,150	41,632	257,782	1,884,034	543,504	2,427,538	88.78	0.60	10.62
總計	1,741,587.82	520,827.82	2,262,415.64	8,808.91	2,554.27	11,363.18	200,757.36	55,226.27	255,983.63	1,951,154.36	580,424.73	2,531,579.09	89.43	0.45	10.12

資料來源：根據昭和二十至三十三年(1927-1938；缺1933年)之《臺灣林業統計》的「林野面積」做成。

附錄二 大正十至昭和十三年(1921-1938)臺北州之林業勞工每人每日工資比較

	1921	1922	1922	1923	1923	1924	1924	1925	1927	1928	1929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8
		上半	下半	上半	下半	上半	下半	下半			上半	下半	蓄地	蓄地	蓄地	蓄地	蓄地	蓄地	蓄地	蓄地
伐木工	—	—	—	1.69	2.13	2.7	2.1	2.1	2.7	2.7	2.7	2.7	2.6	2.6	2.66	2.6	2.6	2.6	2.6	2.5
內地人	1.7	1.7	1.7	1.22	1.14	1.25	1.06	1.06	1.2	1.3	1.1	1.1	1.2	1.16	1.1	1.1	1.1	1.23	1.2	1.73
本島人	—	—	—	—	—	—	—	—	—	—	—	—	—	0.9	0.8	0.8	0.8	0.8	0.8	0.9
蓄人	2.5	2.1	2.1	1.72	1.48	1.95	1.55	1.55	2.2	2.2	2.6	2.6	2.3	2.2	2.2	2.2	2.2	2.2	2.2	2
集材工	1.65	1.65	1.65	1.16	1.1	1.11	0.94	0.94	1	1.2	1.1	1	1.2	1.1	1.07	1.07	1.08	1.1	1.1	1.53
內地人	—	—	—	—	—	—	—	—	—	—	—	—	—	0.7	0.65	0.65	0.65	0.65	0.65	0.8
本島人	1.85	1.6	1.6	1.28	1.23	1.15	0.98	0.98	1.1	1.2	1.1	1.2	1.2	1.2	0.93	0.93	0.93	1.03	1.13	2
運材工	1.85	1.6	1.6	1.28	1.23	1.15	0.98	0.98	1.1	1.2	1.1	1.2	1.2	1.2	0.93	0.93	0.93	1.03	1.13	1.5
內地人	—	—	—	—	—	—	—	—	—	—	—	—	—	0.6	0.6	0.6	0.6	0.6	0.6	0.7
本島人	—	—	—	—	—	—	—	—	—	—	—	—	—	—	—	—	—	—	—	—
蓄人	—	—	—	—	—	—	—	—	—	—	—	—	—	—	—	—	—	—	—	—

說明：1. 缺昭和元(1926)年、昭和十二(1937)年資料。

2. 以臺北州為例因其資料最為完整；然昭和五年(1930)後統計格式有所改變，故又選擇臺北州蓄地。

資料來源：據大正十至昭和十三年《臺灣林業統計》之「林業就業者賃銀表(日給)」做成。

##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大正三年份。臺北：臺灣日日新報。

八戸道雄

1931 〈臺灣の林業〉，收於寺尾辰之助編，《明治林業逸史》，頁443-458。東京：大日本山林會。

八古正義

1932 〈臺灣の森林とその開發〉，《臺灣の山林》79: 28-33。

千葉豐治

1930 〈山が荒るれば平地も荒れる治めませうや荒れ山を〉，《臺灣山林會報》57: 1-10。

大日本山林會

1908 〈森林經營に就て〉，《大日本山林會報》306: 38-40。

1908 〈斗六の模範竹林經營著手〉，《大日本山林會報》312: 39-41。

1908 〈阿里山森林官營〉，《大日本山林會報》313: 56。

1915 〈阿里山經營成績〉，《大日本山林會報》387: 51-52。

1915 〈阿里山經營失敗〉，《大日本山林會報》387: 52-53。

1920 〈米松輸入激増〉，《大日本山林會報》446: 37。

1920 〈木材輸出杜絶〉，《大日本山林會報》456: 54-55。

1921 〈臺灣樟腦減產〉，《大日本山林會報》459: 60。

小澤今朝方(著)、百瀝義(譯)

1957 〈森林計畫與國有林經營計畫的展望〉，《臺灣森林》3(8): 22-28。

山崎嘉夫

1913 《臺灣造林法》。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9 〈臺灣森林令制定の要旨〉，《臺灣時報》3: 21-24。

不著撰人

年代不詳 〈臺灣造林事業保安林林業試驗其他ノ林業經營方針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複製收藏。

不著撰人

年代不詳 〈林野調查及保管林業事務概要〉。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複製收藏。

不著撰人

1910 〈林野開拓情形〉，《臺灣時報》15: 65-66。

不著撰人

1917 〈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上)〉，《臺灣農事報》123: 17-25。

1917 〈臺灣造林事業の沿革及現狀(下)〉，《臺灣農事報》126: 37-42。

井上由扶

1974 《森林經理學》。東京：地球社。

日本林業技術協會

1969 《和英／英和林業語彙》。東京：日本林業技術協會。

月岡貞太郎

1898 〈宜蘭奇萊兩地方林況〉，收於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頁277-314。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

王世慶

1994 〈日據初期臺灣撫墾署始末〉，收於氏著，《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475-546。臺北：聯經。

北條浩

1994 《日本近代林政史の研究》。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古井辰藏

1918 〈森林法上森林の意義に關する大審院の判決を評す〉，《大日本山林會報》422: 43-47。

平賀正二

1929 〈林產物拂下方法の改善と木材の金融化〉，《臺灣山林會報》35: 50-52。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

199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海峽學術。

矢內原忠雄

1929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東京：岩波。

伊藤太右衛門

1924 〈臺灣明日の林政〉，《臺灣山林會報》7: 5-12。

安詮院吉弘

1929 〈木材關稅問題の經緯〉，《臺灣山林會報》37: 13-50。

安詮院貞熊

1923 〈臺灣林業發展の方策〉，《臺灣農事報》200: 22-42。

1923 《臺灣森林令大要》。臺北：著者。

1923 〈新聞紙を通じて觀たる母國林政の新傾向〉，《臺灣山林會報》8: 7-12。

1924 〈臺灣に於ける國有林產物買賣の史的考察〉，《臺灣山林會報》9: 16-26。

1928 〈森林計畫事業の著想須く遠大なれ〉，《臺灣山林會報》33: 3-7。

佐治孝德

1932 〈臺灣の營林事業に就て〉，《臺灣の山林》79: 54-58。

吳樹權

2000 〈臺灣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變遷之研究：日治時期迄今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演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論文。

李文良

1996 〈日治時期臺灣林野整理事業之研究——以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1996 〈日治初期臺灣林野經營之展開過程——以大科坎(桃園大溪)地區為中心〉，《臺灣史研究》3(1): 144-169。

1997 〈林野整理與東臺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型態(1910-1925)〉，《東臺灣研究》2: 169-190。

1999 《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2000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林野支配與所有權——以「緣故關係」為中心〉，《臺灣史研究》5(2): 35-54。

2000 〈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杉本良

1929 〈臺灣林業所感〉，《臺灣山林會報》38: 6-21。

杉本壽

1976 《林野所有權の研究》。東京：清文堂。

周憲文

1980 《臺灣經濟史》。臺北：開明。

東村龍成

1934 〈山村民の安全と福祉を祈願して〉，《臺灣の山林》104: 1-7。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

1910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施業案（1910年六月制定）〉。南投：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藏。

1916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整理案（大正五年編）〉。南投：國立臺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藏。

1940 《東京帝國大學農林部附屬臺灣演習林概要》。東京：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附屬臺灣演習林。

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

1924 〈林務會議に於ける殖産局長訓示〉，《臺灣山林會報》7: 2-4。

1932 〈臺灣林業最近十年の鳥瞰〉，《臺灣の山林》78: 65-101。

1933 《臺灣的林業》（昭和八年版）。臺北：社團法人臺灣山林會。

金平亮三

1911 〈巒大山伐木事業〉，《臺灣農事報》54: 1-14。

青木繁

1925 《臺灣林業上の基礎知識》。臺北：新高堂。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3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

洪廣冀

2002 〈戰後初期之臺灣國有林經營問題：以國有林伐採制度爲個案〉，《臺灣史研究》9(1): 55-105。

相原言三郎

1923 〈森林勞動問題に對する二三の考察〉，《大日本山林會報》485: 29-44。

胡家瑜、林欣宜

2003 〈南庄地區開發與賽夏族群邊界的再檢視〉，《臺大文史哲學報》59: 177-214。

若林正丈

1983 〈總督政治の臺灣土著資産階級——公立臺中公學校設立問題（1912-1915）〉，《アジア研究》29(4): 1-41。

宮瀨浩

1924 〈森林労働者と臺灣〉，《臺灣山林會報》8: 13-19。

1933 〈營林所材とその市場〉，《臺灣の山林》85: 129-134。

高橋琢也

1931 〈林區制度の創立〉，收於寺尾辰之助編，《明治林業逸史》，頁79-81。東京：大日本山林會。

涂照彥（著）、李明峻（譯）

1992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臺北：人間。

張中和

1963 〈臺灣之林產物處分〉，《臺灣銀行季刊》16(1): 24-38。

張宗漢

2001 《光復前臺灣之工業化》。臺北：聯經。

梁華璜

1978 〈竹林事件探討——日本帝國主義掠奪臺灣林地之一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5: 256-286。

淺野安吉

1932 〈臺灣林業の回顧〉，《臺灣の山林》78: 15-18。

深谷留三、野仲忠彥

1928 〈臺灣に於ける私有林業の振興と森林組合〉，《臺灣山林會報》34: 2-11。

陳偉智

- 1997 〈田代安定與「臺東殖民地預察報文」——殖民主義、知識建構與東部臺灣的再現政治〉，《東臺灣研究》3: 103-146。

陳國川

- 2001 〈日治時代雲林地區官有原野的開發〉，《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3: 1-51。

陳國棟

- 1995 〈軍工匠首與清領時期臺灣的伐木問題：1683-1875〉，《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7(1): 123-158。  
1995 〈臺灣的非拓墾性伐林（約 1600-1976）〉，收於劉翠溶、尹懋可編，《積漸所至：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下）》，頁 1017-1062。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陳盛韶

- 1963 〈軍工廠〉，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頁 381-382。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曾昭鉅

- 1950 〈談林產處分上之「緣故關係」〉，《林產通訊》9(2): 6-7。

渡邊全

- 1922 〈外國材の輸入に就て〉，《大日本山林會報》477: 33。  
1923 《外材輸入の局勢と其對策》。東京：財團法人帝國山林會。  
1938 《日本の林業と農山村經濟の更生》。東京：養賢堂。

程士毅

- 1994 〈軍工匠人與臺灣中部的開發問題〉，《臺灣風物》44(3): 13-50。

賀田直治

- 1917 《臺灣林業史》，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7 《臺灣林業史》，第二卷。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鈴木倉太郎

- 1924 〈保安林の禁伐と其損害補償に就て〉，《大日本山林會報》503: 21-32。

萩野敏雄

- 1965 《朝鮮、滿州、臺灣林業發達史論》。東京：財團法人林野弘濟會。  
1990 《日本近代林政の發達過程——その實證的研究》。東京：日本林業調查會。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 1926 《臺灣官有林野整理事業報告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 1924 《臺灣樟腦專賣志》。臺北：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 1911 《臺灣の林野》。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5 《臺灣林野調查事業報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8 《領臺二十年臺灣林業之沿革並成績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19 《林野事務主任會議議事錄》。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2 《臺灣主要林木生長量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24 《臺灣林務法規》。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1 《臺灣林業ノ基本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7 《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上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1937 《森林計畫事業報告書》下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

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

- 1918-1942 《臺灣林業統計》。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編）

1898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課。

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1919 《臺灣林野法規》。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1919 《林業一斑》。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1920 《濁水溪上游地域治水森林調查書》。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局。

臺灣總督府營林所

1932 《臺灣材》。臺北：臺灣總督府營林所。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

1989 《理蕃誌稿》，第一卷。東京：青史社。

戴炎輝

1979 《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上。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1910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臺灣私法》，第一卷下。臺北：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藍鼎元

1958 〈覆制軍臺疆經理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東征集》，臺灣文獻叢刊第12種，頁32-40。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麴田生

1909 〈更に阿里山問題を講究せよ〉，《大日本山林會報》324: 22-28。

Appuhn, Karl

2000 "Inventing Nature: Forests, Forestry, and State Power in Renaissance Venic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861-889.

Arnold, David

1996 *The Problem of Nature: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European Expansion*.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Foucault, Michel

1991 "Governmental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87-11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rdon, Colin

1991 "Governmentality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1-5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ove, Richard

1995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ha, Ramachandra

2000 *Unquiet Woods: the Ecological Bases of Ecological Resistance in the Himalay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adrick, Daniel

1981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ebaugh, Peter
- 1976 "Karl Marx, the Theft of the Wood, and 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Current Debate." *Crime and Social Justice* 6: 5-16.
- Lowood, Henry
- 1990 "The Calculating Forester: Quantification, Cameral Science, and 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Forestry in Germany." In Tore Frangsmyr, J. Heilbron and Robin Rider eds., *The Quantifying Spirit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pp. 315-3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Marx, Karl
- 1975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Rhine Province Assembly. Third Article. Debates on the Law of the Theft of Wood." In Richard Dixon trans. and ed.,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ume I*, pp. 224-263.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7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Peluso, Nancy
- 1992 *Rich Forests, Poor People: Resource 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Jav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asquino, Pasquale
- 1991 "Theatrum Politicum: The Genealogy of Capital- Police and the State of Prosperity." In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pp. 105-11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jan, Ravi
- 1998 "Imperial Environmentalism or Environmentalism? European Forestry, Colonial Foresters and the Agendas of Forest Management in British India 1800-1900." In Richard Grove, Vinita Damodaran and Satpal Sangwan,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 324-371.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ngwan, Satpal
- 1998 "From Gentlemen Amateurs to Professionals: Reassessing the Natural Science Tradition in Colonial India 1780-1840." In Richard Grove, Vinita Damodaran and Satpal Sangwan,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p. 210-236.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varamakrishnan, K.
- 1999 *Modern Forests: Statemaking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Colonial Eastern Ind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Edward.
- 1975 *Whigs and Hunters: The Origin of the Black Act*. London: Allen Lane.
- Tribe, Keith
- 1980 "Camer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 172-196.
- Ts'ui-jung Liu and Shi-yung Liu (劉翠溶與劉士永)
- 2000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aiwan's Forest Reserve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 Legacy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6(1): 1-34.

Vandergeest, Peter and Nancy Peluso

1995 "Territorialization and State Power in Thailand." *Theory and Society* 24: 385-426.

Worster, Donald

1988 "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289-308.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dern Forestry, Capitalism and the Governance of Frontier: Som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Rinya*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Goang-jih Horng

###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rinya* (forests and wild land) as its focus, accompanied with the triangul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discuss if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uch investig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rinya* in Taiwan's *shihonshugika*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by researchers from *Tadao Yanaihara* downward are appropriate.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view toward forest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generated after the connection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heterogeneities of forest resources to explain in a holistic scale how the *rinya* was incorporated into colonial control, allocated to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then reached "*shihonshugika*".

At the beginning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divided the *rinya* into forest lands and forest products through institutions so as to identify the contents of stakeholders' rights. While confronting the existing customary practices of forestry in Taiwan's society, there were problems of articulating the customary practices and new regulations that frequently occurred. The primary resolution did not come out until the establishment of *engokanke-rinya* (occupation relationships)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of *rinya*. As a comparison, although the capitalists that resided in the government-owned *rinya*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and wastelands development deployed *takushokukeiei* (management by colonizing and reclaiming) mainly to the forest lands, the revenue that emanated from the forest products was the important incentive of accelerating the alliance of capitalists and government.

After undertaking the arrangement of government-owned *rinya* in the 1920s,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divided the government-owned *rinya* into preserved and non-preserved area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orting out the forest people and their *engokanke-rinya*. Through property devolving, knowledge inculcation and law en-

forcement,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convert these people who resided around the government-owned *rinya* into forest managers who could live on their own and be no harm to forest protection. Benefits to forest products and lumber industries came about due to World War I. However, those capitalists located in the non-preserved *rinya* and who were unable to arrange in time took liberty of the war and the convenience of colonizing and reclaiming the forest lands to undertake operations that resulted in serious deforestation, which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conservation ideas prescribed in forest law. Thus,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not only concentrated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forests, but also integrated the strengths of capitalists to manage the national forests efficiently.

This government-led model was unexpectedly squeezed between Japan and a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urned the profits of *rinya* into a concern over waste. Consequently, a knowledge system package originating from the European continent's scientific forestry was appropriated. The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tried to reform the existing systems of forest management and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1930s. As to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rinya* which has focused on the primary and mid-term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is paper adjusts the errors implicated in evolutionist explanations and the unsuitabil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y into history on some leve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roviding possible spaces for dialogue between the research traditions of Taiwan's *shihonshugika* and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

**Keywords:** *rinya*, arrangement of forest and wild land, modern forestry, *shihonshugika*, environmental history